

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疾病文本的細讀與遠讀*

劉苑如**、羅珮瑄***、邱琬淳****、陳雅琳*****

摘要

數位人文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參與文學研究，其電子文本的儲存型態與數位技術的運算分析，往往能帶給傳統文學研究嶄新的視野。本文結合數位遠讀與文本細讀，藉由權威詞檔的群組共現，選擇「疾病敘述與動物想像」及「疾病敘述與醫藥關懷」兩個研究主題。前者從詞頻出發，探討動物如何脫離上古神話圖騰、政治象徵的平面形象，進入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的疾病敘述，或為病痛喻象的想像來源，或為醫療體系的一環，或為疾病事件中的角色。其中既有物、我共生，家族一體的自覺，又隱含對頻繁跨界現象的不安；後者透過權威詞的共現與互動，觀察醫藥在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裡的疾病敘述，於病患身心所發生的作用與轉變、乃至此間所開展的人際互動。在疾疫連綿不絕的中古時期，疾病與死亡緊密相依，宗教色彩與生死關懷乃為此間最重要的核心。

以權威詞所建構的問題意識出發，將疾病視為一種生命的特殊情境，運用數位人文研究平台上的詞頻統計、共現分析等工具，分析魏

* 本文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劉苑如所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疾病感覺地圖：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的疾病書寫與 GIS 資料庫」(NSC 101-2410-H-001-053-MY2) 成果之一，前言與結論之外，分別由劉苑如、羅珮瑄、邱琬淳、陳雅琳依序各自負責撰寫一節。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晉南北朝筆記小說中疾病事件和感覺結構，統計數據與視覺化圖表容易披露現象或趨勢，有些符合常識，有些則引人好奇，然落差所產生的縫隙，正是數位人文學探索的起點。

關鍵詞：遠讀、細讀、感覺結構、疾病敘述、共現分析、權威詞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曹丕〈與吳質書〉¹

一、前言

文本閱讀與數位研究相遇，究竟只能擷取百分之一的資訊，彼此輕輕地擦身而過？²還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本文乃是多層文本的概念下，從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以下簡稱小說）當中抽取不同疾病概念的權威詞群，³透過詞頻統計和共現關係，重新形構疾病文本的閱讀空間。理論上，每一類權威詞群皆可以延展出一個文本空間（代表一種問題意識、或者一種情境），而每一類權威詞群彼此的交錯，又可以形成更大的文本空間，透過這種空間互動，理應可以挖掘更多元的文本意義。究竟這種假設是否成立？又可否透過數據呈顯出來？凡此為本文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

本文選擇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中的疾病敘事作為基本材料，基於以下兩個考慮：

一是魏晉南北朝小說的資料特性。目前所見的小說專書、小說合集皆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匯集了某一期間內的相關屬性的軼聞編纂而成。因此不同書之間常有內容重複的現象，其中篇章可能經過濃縮措要，已非原來的文字；甚至全書都是由輯佚者精心揣摩，再加上個

¹ 〔魏〕曹丕，〈與吳質書〉，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42，頁1896。

² 參見 Jack W. Chen, Zoe Borovsky, Yoh Kawano and Ryan Chen, “The Shishuo xinyu as Data Visualization,” *Early Medieval China* 20 (2014): 25.

³ 中國傳統「小說」概念乃是與「大道」對舉的殘叢小語，也代表一種與歷史大敘述對抗的小敘述。見劉苑如，《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頁1-35。

人創意，重新編輯而成；⁴ 更有趣的是，在此斷簡殘編中卻有不少佳作，讀來意趣橫生，仍然有其文學性。這些筆記小說基本上顛覆了傳統「作品」的概念，反而適合於現代的「文本性」，每一篇小說既可視為一則獨立的閱讀單位，又可與其他篇目聯繫為一有機體。

二是疾病經驗的普遍性與隱喻性。疾病為人生中普遍的經驗，也具有社會性，影響所及，從疾病的陪伴者、醫療者，乃至整個社會；隨著角色的變化，疾病的意義也就各不相同。有時疾病位居生命的臺前，左右病者一己的生死存亡，但更多時候只是作為遙遠的旁觀者，疾病像是一抹淡淡灰影，掃過心頭。凡此對於病痛的态度，雖然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緒，卻可勾勒出個人與他人之間的分野，也可能形成一種同情共感，一旦將其嵌入文化、社會、政治、或經濟的規範系統，經過制約與不斷地再生產，即成為一種符號象徵，發展為有較長跨度、可資辨識的某種屬性，甚至模式化，轉化為一種較穩固的社會關係。⁵ 事實上，人們將疾病賦予災難的、墮落的、懲罰的意涵，⁶ 甚至形塑成某種身體規訓、政治話語，正是累積了許多社會互

⁴ 有關魏晉南北朝小說的輯佚現象，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搜神後記》即大大顛覆過去這兩本書的流傳本，重新考訂，大幅刪、增編輯而成，見〔晉〕干寶撰、〔宋〕陶潛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冊上，頁86-114、冊下，頁601-775。而拙作〈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則是以《玄中記》個案為例，探討編者與輯佚者之間的對話與創造，見劉苑如，〈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1期（2007年9月）頁29-74。

⁵ 〔美〕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著，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原序即強調在醫療過程中，除患者的「身」、病與症狀外，還必須注意「人」的病痛與經驗。詳參〔美〕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著，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年），頁ix。有關情感社會學的理論模式，則可參見潘澤泉，〈理論範式和現代性議題：一個情感社會學的分析框架〉，《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4期，頁52-56。

⁶ 參見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96-112. 中譯本有〔美〕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頁86-101。

動、情感標識，逐漸累積為一種共同的情感意識。過去有關疾病的研究已多，從疾病觀（包括病種、病因、病徵、病理）、疾病史、疾病隱喻、疾病和病痛的書寫策略，乃至文學治療等，不乏精采之作，⁷ 惟尚缺乏數位人文的介入，在完整資料庫的支撐下，根據權威詞的共現情形，採取細讀與遠讀兼具的研究方法，將疾病視為一種生命的特殊情境，探討個人、親友與他人在生病期間的社會行動、生命記憶和空間氛圍，由此解析魏晉南北朝小說疾病文本所反映的感覺結構。⁸ 特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誠如開篇所引的曹丕（187-226）〈與吳質書〉，疾疫與死難彷彿雙輪馬車，席捲曹魏文壇，在社會中醞釀出一股濃厚的死亡氛圍。這種由特定作品所呈現出來疾病感覺，如何由個人庫存性（時間性）和場域性（空間性）的感情世界，整合成一個有序且可預見、大的情感世界，端賴找出各種情感行為的共性，⁹ 而軼聞性質的魏晉南北朝小說應可更凝聚出魏晉南北朝時代共同的感觉結構。

⁷ 身體與疾病作為一個文化史研究的課題，在學界已行之已久，也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參見研究計畫成果網站「東亞文學與文化地圖」上的參考文獻與研究回顧。<http://www.sds.com.tw/web/sinica/eastern-asia/main.html?page=p9>，瀏覽日期：2019年10月14日。

⁸ 感覺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最早出現在 Raymond Williams 的《電影序言》中，在閱讀和吸收了相關人類學和社會學著作後，逐漸通過定義和修正方法，最後納入其文化唯物論中。見 Raymond Williams, and Michael Orrom, *Preface to Film*, (London: Film Drama, 1954)。而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一書中設有專節處理。威廉斯指出：「我們談及的正是關於衝動、抑制以及精神狀態等個性氣質因素，正是關於意識和關係的特定的有影響力的因素——不是與思想觀念相對立的感受，而是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和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這是一種現時在場的，處於活躍著的、正相互關聯著的連續性之中的實踐意識。於是，我們正在把這些因素界定為一種『結構』，界定為一套有著種種特定的內部關係——既相互聯結又彼此緊張的關係的『結構』。」這裡強調了這種意識存在於生活文化的總體表現中，同時兼具有實踐性和生命變化的穩定性。在當前文學與文本研究中，則常被用來考察特定群體的意識結構與心理結構。見〔英〕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王爾勃、周莉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41。

⁹ 參見郭景萍，《情感社會學：理論·歷史·現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頁47-52。

本文有三個部分，首先檢討魏晉南北朝小說文本的讀法，包括文本是否等值？誰來決定文本的讀法？其次運用數位工具來清理文本、建立各類權威詞、透過詞頻共現來拓展文本空間，挖掘文本可能的意義；並且分析、檢討數位人文視野下的魏晉南北朝小說文本閱讀，其功能、限制與加值的可能性。

二、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疾病文本的兩種讀法： 從細讀到遠讀

傳統的文學閱讀，把作品視為由句子、段落和篇章，根據一定語意規則連貫，組成一種整體語句的意義系統，有待讀者解讀出其中的意義。而文本的定義則有廣、狹的差異，以及不同時期派別的轉變，基本上都認為有別於以書或篇章等實有存在的作品，更毋寧可視為一種方法論，而以一種論述的形式存在。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理論為例，即非常具有形象性，他基於語言符號來設想，認為文本具有一種立體圖案的複性（stereographic plurality），並以星群爆發形容「能指」的分裂狀態，以此描述意義的播種（disseminate），換言之，文本的意義不再是固定不變的，而具有一種開放性，可經由閱讀者透過能指的轉喻關係，不斷地增殖和擴張；¹⁰他又宣稱「作者已死」，應是為一種典範轉移之際的革命性宣言，實際上在當代的文學閱讀中並不意謂著可以漫無標準，作者原義與讀者閱讀之間固然有所區別，卻絕對有所聯繫，也就是說透過閱讀既可以

¹⁰ 參見〔法〕羅蘭·巴特，〈從作品到本文〉，收入朱耀偉編譯，《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臺北：駱駝出版社，1992年），頁15-23。本文原題為“De l'oeuvre au texte”，後經 Josué V. Harari 英譯，收入 Josué V. Harari,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73-81.再全文譯出。其中“text”一字，筆者慣採「文本」，而本書譯者這裡實譯作「本文」，為顧及全文用字的統一，仍襲用前者譯名，若有不妥之處，筆者自負文責。

尋求作者原義，也可以發現新的意義空間，¹¹ 或可說文本與作品共存了一些隱藏於作品內容外的事物。但在數位研究的數據化過程中，割裂的文本是否更加徹底實踐了巴特的「預言」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是先回到當代的閱讀，檢視究竟隱藏於文本與作品共存的事物有哪些呢？即使從現代文本的觀點，要維持文本的同一性必須有一種本質內核，雖然作者、讀者、語境、社會、語言和文本本身都有其作用，但不能憑藉著自身獨自起作用，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文本的文化功能，也就是共享的某種價值、信仰和行為準則的共同體決定了意義限度。¹² 文化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文本的意義也並不總是按同一種方式被決定，就小說文本而言，無論是魏晉南北朝小說的作者、編者和讀者都基本上還是都受到「小說」文類的引導與制約。陳文新歸納了傳統的小說觀，並從實際的例子分析，認為古「小說」以議論為宗，卻也樂於娓娓動聽地敘述故事。小說的敘事意味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進一步增強。¹³ 由此不但可發現魏晉南北朝小說文類的主導性因素，¹⁴ 還可看出文類的概念並非一成不變的。他進一步指出，在劉知幾（661-721）的觀念中，「雜記」相當於志怪小說，「小說」的首要使命是「記」而不是「議」。它與正史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涉及軍國大事，「小說」則是補正史之遺。¹⁵ 當然其他研究者也有從不同角度立論者，如莫宜佳（Monika Motsch）通過「異」的概念來定義中國古代的中、短篇小說，用古代中國對於陌生事物既有懼怕蔑視的一面，又有讚賞異人異物作為知識與文化傳播者的一面，而六

¹¹ 王一川，《興辭詩學片語》（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5年），頁58。

¹² 參見〔美〕喬治·J.E. 格雷西亞（Jorge J. E. Gracia）著，汪信硯、李志譯，《文本性理論：邏輯與認識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60-165。

¹³ 見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臺北：志一出版社，1995年），頁8-9。

¹⁴ 有關敘述文的規約和動機，參見〔美〕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66-76。

¹⁵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頁11。

朝時對於異的含意轉向更多的褒意，並著重於妖怪、俠客、神仙和鬼魂四種題材類型。¹⁶ 劉苑如則從「雜」的角度，指出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四種獨特的書寫成規，包括多元敘述觀點、怪異主題意識、常異的對立思考，以及以題旨動機作為主導動機。¹⁷ 而在志人小說方面，新異的題旨動機高於故事動機的特色依然成立，也即是小南一郎所謂以才、情為中心的美學標準。¹⁸ 因此，從上述不同的說法找尋出最大公約數，作為魏晉南北朝小說文類在創作、閱讀之際共同的規約，應即是透過具體的事例來傳達某一種事理或價值，以表現一種時代的「異」趣。

回到具體的例子，可分別以《裴子語林》和《列異傳》中的兩個疾病文本為例，表列如下：

《裴子語林》	《列異傳》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矣。 ¹⁹	魏郡張奮者，家巨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鄴人何文。文日莫，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

¹⁶ 〔德〕莫宜佳（Monika Motsch）著，韋凌譯，《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從文類、主題到敘事話語的衍生與嬗變，觀照「異」概念在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的發展，並闡發了中國文學史中「異」的藝術的創造及其接受歷史。見〔德〕莫宜佳（Monika Motsch）著，韋凌譯，《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1-15、50-65。

¹⁷ 參見劉苑如，〈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點所作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8期（1996年3月），頁365-400。

¹⁸ 參見〔日〕小南一郎，〈『世說新語』的美學——魏晉の才の情をめぐって〉，收入〔日〕小南一郎編，《中國中世史研究統編》（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1995年），頁434-472。中文版為〔日〕小南一郎著，〔日〕藤奈津紀譯，〈《世說新語》的美學——以魏晉的才與情為中心〉，收入劉苑如編，《桃之宴：京都桃會與漢學新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年），頁23-52。

¹⁹ 見〔晉〕裴啟，《裴子語林》，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頁38。

	二更，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²⁰
--	---

從表第一欄《裴子語林》的文本看起，那是由病、稱藥、量水等三個動作所組成的文本，又可衍生出生病和侍疾兩個事件。然這樣的記載只是一個客觀事實的敘述？還是有其他意義？則必須透過《裴子語林》的書名定義，才能將這則文本視為一個魏晉南北朝小說文本。換言之，如此簡單的文本，省略了歷史時間、社會背景，僅僅紀錄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片段行為，留下很大的空白，究竟王仲祖生什麼病？為何生病？還有王仲祖、劉真長、荀令則是到底是什麼樣人？三人有什麼關係？為什麼王仲祖生病，劉真長、荀令則兩人前來侍疾呢？這則

²⁰ 見〔魏〕曹丕，《列異傳》，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119；本事亦見諸〔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卷18，頁135。文字略異。比如「鄰人何文」，《搜神記》記為「鄰人阿文」。

故事的意義何在？表現出什麼樣的文學趣味？實非由文本表層就可以提供資訊，而必須透過《裴子語林》的小說框架，邀請讀者共同參與，以尋求更多的輔助資訊來補白，如此則既在意義理解上賦予一種文學的文化限定，又可增加讀者在可解與難解糾纏中的閱讀愉悅。²¹而在賦義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從《裴子語林》的互文中找尋線索，但由於該書在宋以後散佚，現今我們對於此書佚文的認知，很大部分還是從同類型的《郭子》、《世說新語》等志人小說來理解，這類小說多記載漢晉名士的特行異品與佳言雋語，體現了這些人的價值取向；²²其次則是相關注釋、研究文獻和歷史史料。如此，可以在《裴子語林》178則敘事中，²³發現劉真長（或稱劉尹）、王仲祖（或稱王長史、阿奴）、荀令三人在當時齊名，也是當時的風流名士。²⁴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儘管是病篤垂危，此一文本表面的負面陳述都非意旨所在，而是藉此構成一種逆向的生命情境，反襯出主人翁的不凡氣度。

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的疾病書寫多半有比較完整的情節敘述，抽絲剝繭地找出致病的原因，不像是志人小說敘述只留下最簡潔的人物動作或言語，而常留有大量的空白，如表第二欄所引《列異傳》，講述何文無懼死病的禁忌，從而發現金、銀、杵等精怪盤據舊宅的真

²¹ 參見姜廣振，〈論裴啟《語林》的敘事藝術〉，《勝利油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3期，頁12-13。

²² 參見羅玲雲，〈《郭子》與《語林》、《世說新語》〉，《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頁114-118。

²³ 根據黃東陽考證，以魯迅《古小說鉤沉》的《語林》為底本，共得179則，刪去誤收3則，待考1則，得175則，補入〈類林〉、〈洞玉集〉、〈語對〉三書所引的三則後，目前〈語林〉可信的佚文共計178則。見黃東陽著，〈晉裴啟《語林》之佚文考辨——兼論其品鑒人物的思考模式〉，《東吳中文學報》第13期（2007年5月），頁31-49。

²⁴ 詳見劉宛如，〈問疾：論魏晉南北朝小說疾病敘事中的公、私想像〉，（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韓國延世大學合辦「情感與「東亞的感性與公共性（II）——日常的結構化和歷史性動力下的新情感」國際學術會議，2014年）。

相，最後得以除妖致富的故事。該則故事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也是非常典型的器物精怪作祟的故事類型，在死亡事件揭密的期待下，亦穿插了非常形象化角色，以及擬仿的重複情節，形成一種特殊的諧趣。然而在故事趣味下，不可忘記這類小說的題旨動機，儘管漢魏六朝時期的精怪世界總是對人類世界顯示出一種的窺視與侵犯姿態，似乎與人類尚處於一種緊張的敵對狀態，²⁵ 然而更深層的意義必須著眼於文化心理，顯示出當時人既著迷於探索物質所形成異世界，也同時傳達出一種「物物而不物於物」的思想示例。

有別於將文本放在小說的敘述框架中細讀（close reading），倘若將上述兩則文本根據特定的研究主題，當作一種類型的疾病文本則又會有何不同的讀法？從疾病敘事的角度來說，兩則字數相差了十倍有餘的文本，前者短短不到二十字，可分為生病、療養兩個子事件，並可由此可揭示病者與侍病者間的關係；後者二百多字則是利用懸念的方式，揭發程家相繼死病的原因，反而被視為只有一個疾病的核心事件。可見同一個文本會因問題意識、閱讀的角度而有所逆轉，經過分解、計算產生不同結果。因此本文欲兼採遠讀（distant reading），²⁶ 來觀察魏晉南北朝小說疾病事件中權威詞的分群、分布與共現情形，試圖以人文研究的角度，賦予數位文本更豐富的解釋。儘管在數據化的過程將會割裂原本的敘述文本，變成量化的標籤；無法確認語詞的主詞與述語，失去了原本的文本脈絡，成為一團文字雲：

²⁵ 參見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344。

²⁶ 隨著物質性的改變，也改變了閱讀的方式。Franco Moretti 早在 2005 年便提出遠距閱讀（distant reading）的概念，2013 年出版同名專書則是此一文學研究方法的演示，成為數位人文領域所熟知並廣泛運用的研究方法。參見 Franco Moretti,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5), I-II;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13).



圖一：魏晉南北朝小說疾病敘述文字雲

疾病敘述的文字雲看似只是一堆文字圓圈的大小群聚，在不帶有問題意識、完全交由電腦自動運算來取得權威詞的時候，往往會發生這樣的困境：如圖一所示，利用 **bi-gram** 得到的二字頻文字雲，結果出現太多明顯的斷詞錯誤。由此可見數位人文學的互動關係裡，人文研究的問題意識作為研究議題方向的主導，選擇適用的數位技術作為工具，來拓展問題意識的能見範圍，從而啟發思考與詮釋的深度，或許是較為有效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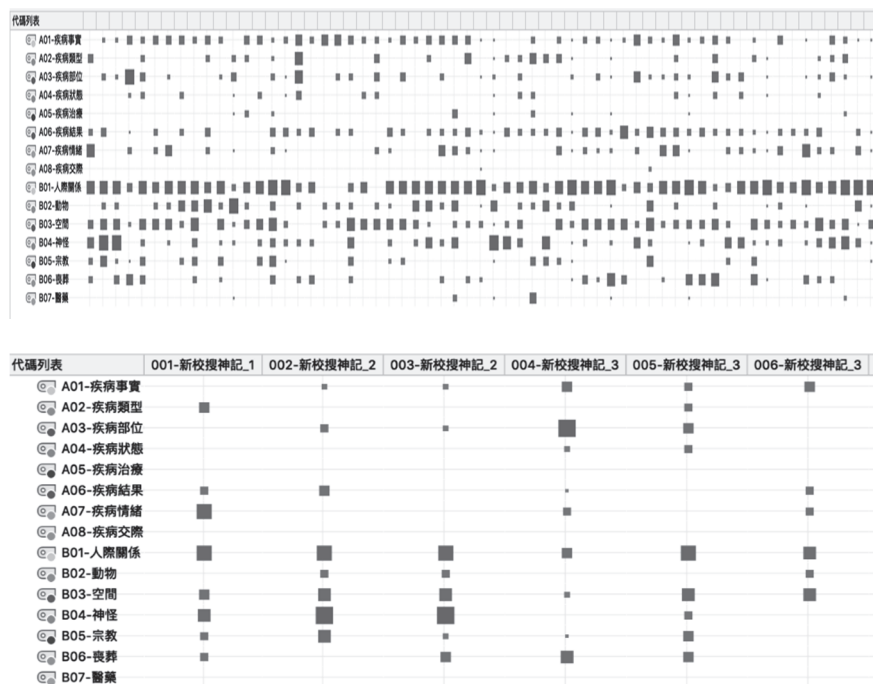
代價/死	A01-疾病事實	A02-疾病類型	A03-感染部位	A04-疾病狀態	A05-疾病治療	A06-疾病結果	A07-疾病情緒	A08-疾病危險	B01-人類關係	B02-動物	B03-空間	B04-神怪	B05-宗教	B06-復興	B07-殞滅	總數
☹ A01-疾病事實		525	1,194	458	328	1,294	1,139	73	4,471	1,032	2,561	1,453	1,005	653	168	16,354
☹ A02-疾病類型	525		529	225	151	460	476	10	2,072	483	1,216	691	440	211	93	7,582
☹ A03-感染部位	1,194	529		513	346	1,114	1,156	70	4,002	935	2,261	1,404	982	606	199	15,311
☹ A04-疾病狀態	458	225	513		101	395	447	16	1,944	359	991	563	386	217	52	6,667
☹ A05-疾病治療	328	151	346	101		260	261	28	1,144	309	591	426	363	142	155	4,607
☹ A06-疾病結果	1,294	460	1,114	395	260		1,173	41	4,174	940	2,419	1,378	885	785	133	15,449
☹ A07-疾病情緒	1,139	476	1,156	447	261	1,173		51	3,767	815	2,208	1,324	936	691	132	14,806
☹ A08-疾病危險	73	10	70	16	28	41	51		258	52	113	99	67	12	16	921
☹ B01-人類關係	4,471	2,072	4,002	1,944	1,144	4,174	3,767	258		3,085	6,026	4,326	3,012	2,398	750	41,459
☹ B02-動物	1,032	483	935	359	309	940	815	52	3,085		1,940	1,206	730	511	206	12,603
☹ B03-空間	2,561	1,216	2,261	991	591	2,419	2,208	113	6,026	1,940		2,683	1,890	1,478	339	26,716
☹ B04-神怪	1,453	691	1,404	563	328	1,376	1,324	99	4,326	1,206	2,683		1,297	778	289	17,917
☹ B05-宗教	1,005	440	982	386	363	885	936	67	3,012	730	1,890	1,297		497	196	12,686
☹ B06-復興	653	211	606	217	142	785	691	27	2,398	511	1,478	778	497		90	9,084
☹ B07-殞滅	168	93	199	52	155	133	132	16	750	206	339	289	196		0	2,818
☹ 總數	16,354	7,582	15,311	6,667	4,607	15,449	14,806	921	41,459	12,603	26,716	17,917	12,686	9,084	2,818	204,780

代碼列表	A01-疾病事實	A02-疾病類型	A03-疾病部位	A04-疾病狀態
A01-疾病事實		525	1,194	458
A02-疾病類型	525		529	225
A03-疾病部位	1,194	529		513
A04-疾病狀態	458	225	513	
A05-疾病治療	328	151	346	101
A06-疾病結果	1,294	460	1,114	395
A07-疾病情緒	1,139	476	1,156	447
A08-疾病交際	73	10	70	16
B01-人際關係	4,471	2,072	4,002	1,944
B02-動物	1,032	483	935	359
B03-空間	2,561	1,216	2,261	991
B04-神怪	1,453	691	1,404	563
B05-宗教	1,005	440	982	386
B06-喪葬	653	211	606	217
B07-醫藥	168	93	199	52
總數	16,354	7,582	15,311	6,667

圖二：疾病文本與分類權威詞關連表（全圖、局部放大）²⁷

因此在具體的操作上，一如圖二所示，可根據疾病敘述文本的內容，分為疾病事實、疾病類型、疾病部位、疾病狀態、疾病治療、疾病結果和疾病交際等項目；然後再根據研究的問題意識，設定人際關係、動物、空間、神怪、宗教、喪葬和醫藥等，一方面透過人文研究者的細讀所累積的知識，一方面搭配數位工具如 N-gram 的運算，從而得出每一個項目中的權威詞，進行詞頻的計算，最後利用 MAXQDA 質性研究軟體對所有疾病敘述文本進行標記，既可觀察整體的分佈趨勢，也能看到每一則疾病敘述文本的細節。

²⁷ 圖二：疾病文本與分類權威詞關連表全圖，請見《清華中文學報》電子期刊網頁之「附圖一」，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68241.r3772.php?Lang=zh-tw>



圖三：疾病文本權威詞標記分佈圖（全圖、局部放大圖）²⁸

從圖三中可見，直排的点即為每一則疾病敘述文本中權威詞的分布狀況，橫列則是每一類權威詞在疾病敘述文本的分布狀況。據此可以看出一則疾病敘述文本，通常會包括疾病事實和疾病結果的陳述，再依題旨敘述各有偏重，或描述疾病的情緒，或記載疾病狀態，或涉及醫療；從權威詞的分佈來看，則可見疾病並非只是個人的事，而是涉及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常與宗教、神怪和動物有關，特別從數據來看更為清楚。

綜而言之，數位人文視野下的文本遠讀與細讀，其所蘊含的訊息

²⁸ 圖三：疾病文本權威詞標記分佈圖全圖，請見《清華中文學報》電子期刊網頁之「附圖二」，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68241,r3772.php?Lang=zh-tw>

量在閱讀過程中可能產生質量上的變化，在縱橫交叉、關聯比較的訊息排列當中，將衍生出更多可以探索的議題，以下藉由魏晉南北朝小說中的疾病文本為例，嘗試進一步討論這套閱讀法的可能性。

三、疾病敘述文本的數位擷取與疾病敘述權威詞的建置

本文所謂的疾病敘述文本，意指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中有關疾病事件的描述，這些描述的範圍有時與一條筆記小說的文本相當，有時則只是其中一個段落，如何從大量的數位文本當中擷取出這些敘述段落，本文運用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開發之「數位人文研究平台」，²⁹ 匯入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所收錄魏晉南北朝小說的數位文本，³⁰ 包含余嘉錫（1884-1955）《世說新語箋疏》、³¹ 魯迅（1881-1936）《古小說鉤沉》、胡懷琛（1886-1938）《新校搜神記》，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Ctext）當中的《搜神後記》、《拾遺記》、《續齊諧記》、《神仙傳》、《還冤記》、《異苑》、《博物志》，以及自行建置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³² 部分小說有當代學者整理或校注的版本，則在匯入數位文本之後，參考這些研究成果來進行二次校對的後處理，以獲取符合學界共識的權威文本。所有數位文本的版本與後處理方式，可參見附表一「魏晉南北朝小說數位文本版本說明」。³³

其次建置標記疾病敘述文本所需要的權威詞，在事件方面，包含了：疾病事實、疾病類型、疾病部位、疾病狀態、疾病治療、疾病結

²⁹ 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http://dh.ascdc.sinica.edu.tw/member/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³⁰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ji.sinica.edu.tw/>，瀏覽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³¹ 〔劉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

³²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https://ctext.org/zh>，瀏覽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³³ 附表一：「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版本」，請見《清華中文學報》電子期刊網頁，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68241_r3772.php?Lang=zh-tw

果、疾病情緒、疾病交際等八個項目；在研究議題方面，則涉及：人際關係、動物、空間、神怪、宗教、喪葬、醫藥等七個項目。建置的流程，首先根據人文學者既有的閱讀經驗來窮舉可能的詞彙；其次運用數位工具校正錯誤與增補闕漏，具體的做法包含：

1. 利用漢字構形上特徵，匯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系統當中的字表之後，再進行全文掃描，找出包含這些字彙的段落。與疾病相關的字彙具有形符「疒」；與動物相關的字彙具有形符「牛」、「豸」、「羊」、「虎」、「虫」、「豸」、「魚」、「鳥」、「豕」、「隹」、「馬」、「鹿」、「黽」、「鼠」、「龍」、「龜」；與情緒與感覺表現相關的字彙則具有形符「忄」等。
2. 利用中古時代的類書的分類原則來增補，如《太平廣記》當中的動物類。
3. 利用「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所提供的 N-gram 工具，進行二字頻和三字頻的分析，針對其中出現頻率超過 100 筆以上的辭彙進行除錯。單字頻的參考性較低，不適用於權威詞的建置，同時考慮到中古漢語詞彙的結構，多為二字詞或三字詞，很少會長於三字以上，藉由字頻分析，快速過濾、校正辭書與窮舉法的漏網之魚。
4. 透過以上幾種方式，列出基本權威詞，進行標記。
5. 運用權威詞標記篩選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於篩選結果中以人工複檢排除錯誤與增補闕漏詞彙，然後再重新篩選。如此反覆數次，至不再新增辭彙與文本段落為止，共得出 487 筆疾病敘述文本，權威詞表參見附表二。³⁴

共現分析 (co-occurrence analysis) 原本是資訊檢索與科學計量學

³⁴ 附表二：「疾病敘述分類權威詞詞頻表」，請見《清華中文學報》電子期刊網頁，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68241_r3772.php?Lang=zh-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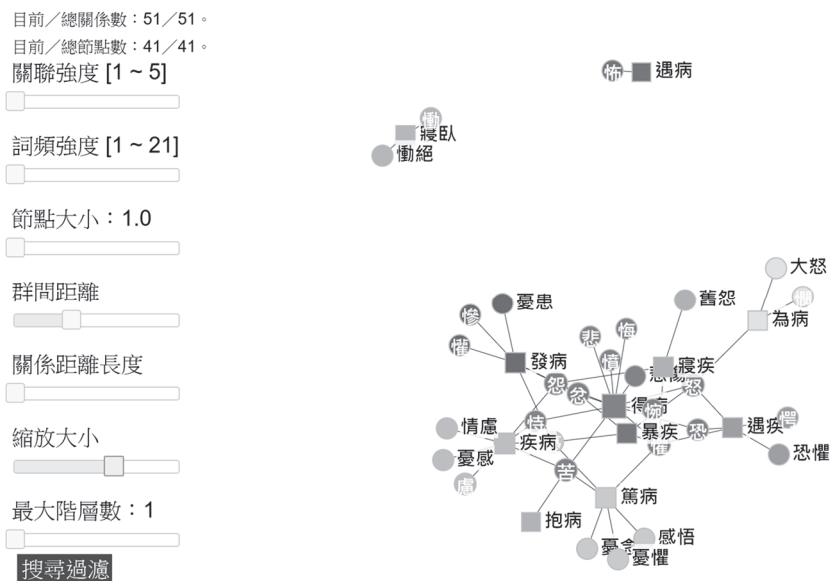
中，將主題相關的文件，歸類（cluster）在一起的常用方法。兩篇文章，若使用到相同的字詞，則二者之間便因共同出現的詞彙而形成共現關係，共現關係越頻繁，兩篇文章在主題上應該就越相似，換言之，共現分析乃是基於這種假設所做的主題擷取或主題歸類分析，同時也聯繫起一群詞彙或一群文件，進而計算彼此相關程度，達到分類的目的。進行共現分析時，概念上是將所有文件的重要詞彙找出，列出每一個詞彙在每一篇文章的出現次數或是權重，以建構出詞彙文件矩陣，進而計算出文件與文件之間的相似度矩陣，再透過各種歸類技術，如層次凝聚歸類法（hierarchical agglomerative clustering）、K-means、奇異值分解法（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等，將文件歸類到不同的主題類別去，並且可以知道主題與主題之間的相似程度，而劃出主題地圖。但實際運用共現分析時，有時會碰到同義異形詞、同義但不同型態的詞彙、或者同形異義詞等，皆會影響共現分析的效果，而需要進一步清理文本、除錯或消歧。³⁵

而本文所採取的權威詞共現分析，在設計權威詞的過程裡，藉由文史研究與數位技術的交叉擷取，以建立分類權威詞，並獲得魏晉南北朝小說的疾病敘述文本，然後以一則疾病敘述文本為單位，即計算權威詞在哪些文本當中出現，同一則文本裡即使反覆出現該詞，也都視為一次，以繪製權威詞共現圖，解釋共現現象、及其背後所反映的文化議題。傳統研究對於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的疾病敘述，固有其基本認識，然而透過數位人文方法的遠讀，也可以印證部分的文學史共識，譬如疾病敘述當中所呈現出來的情緒表現，皆為人之常情（參見圖四「疾病事實（二字詞）——疾病情緒」共現圖），體現出漢魏六

³⁵ 參見曾元顯於《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所編輯的「共字分析（co-word analysis）」詞條（2012年10月），收入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辭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引用網址：<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878/>，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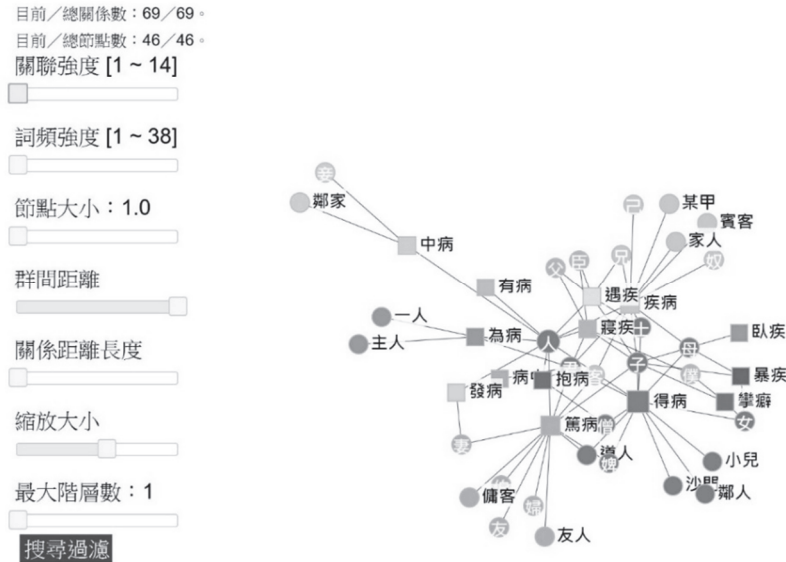
朝文學對生命無常之悲哀與感傷的基調，³⁶ 伴隨著面臨病苦的怖懼與怨憤。

有些時候，共現分析呈現出來的權威詞關聯強度，即使並未完全推翻固有常識，卻聯繫了預期之外的詞彙，譬如圖五所示，疾病事實（二字詞）與人際關係的權威詞共現，基於父母妻子兄弟的倫理關係，在病苦之際往往最易形成問疾與侍疾的照護關係，然而君、女、士、人（一人、有一人）等高強度辭彙的共現，則提醒讀者留意倫理關係以外的人群，這些人群包含有軍隊的將士、地方的鄉人、僧道人士、甚至還有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與鬼神化現，顯然涉及了魏晉南北朝小



圖四：「疾病事實（二字詞）—疾病情緒」權威詞共現圖

³⁶ 有關漢魏六朝文學感傷生命無常的研究非常多，比較方便參考者如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圖五：「疾病事實（二字詞）—人際關係」權威詞共現圖

說的文類特質，及其所在的社會文化語境，該如何詮釋遠讀所揭示的現象，必然得再重回文本細讀的脈絡。³⁷ 以下兩節便是在各種分類權威詞的共現結果中，選擇了從「動物想像」與「醫療關懷」兩個角度，探討數位人文的閱讀法所拓展出來的文本空間，以及其所呈現的疾病感覺。

四、疾病敘述與動物想像

從上古開始，動物在中國文化中即非獨立於人類社會以外的自然對象，人類、動物、鬼神等類別間存在著某些重疊的界線。³⁸ 概觀魏

³⁷ 劉苑如，〈問疾：論魏晉南北朝小說疾病敘事中的公、私想像〉。

³⁸ 英國漢學家胡司德（Roel Sterckx）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4-5。一書研究古代中國的動物觀，將動物作為人類自我認識的對象來考察，認為動物至少有四個方面的角色：首先動物是自然或生物學範疇，其次動物也

晉南北朝筆記小說中的動物形象多元而生動，牠們一方面可能是令人畏懼的山林野獸，如村人每年挑選童男童女獻祭給深山洞穴中的噬人巨蟒，³⁹ 或載錄有人因殺害動物而得病，藉以申誠不應殺生。⁴⁰ 另一方面，動物與人也可能有著互相救助的情誼，如老虎難產尋求產婆協助；農夫協助醫治背疽，巨龍穿井降霖以報；或是玄鶴銜珠以答療瘡之恩等，凡此種種多見於人類之間的情誼互動，竟可類推同現於蟲魚鳥獸之中。⁴¹ 本節透過魏晉南北朝小說疾病文本的分類權威詞檔之共現分析，探討在中國的知識框架與思想世界下，中古疾病敘述中的動物角色、隱喻與想像。進而藉此反思這套病因解釋、病徵描述與治療方法所賴以生存的知識框架與信仰世界。

首先觀察疾病敘述中的動物權威詞詞頻，本文於 487 則魏晉南北朝小說裡的疾病敘述文本當中，共標記出動物類權威詞計 188 則文本、715 個詞彙，參見附表二「疾病敘述分類權威詞詞頻表」的「B02-動物」。⁴² 下列表一動物權威詞檔詞頻統計分析表，先依照各權威詞的詞頻次數遞減排序，⁴³ 並將詞頻次數除以動物類總詞頻數（715）得出各詞於動物類權威詞檔中所佔的百分比，其中詞頻最高的前十種動物分別為「馬、牛、蛇、虎、犬、龍、狗、羊、鳥、魚」。其次統計

是社會實踐的對象，動物又是權力的對象和媒介，最後動物作為形象和符號是人類思維的助手。

³⁹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19，頁 146-147。

⁴⁰ 如《宣驗記》載王導兄弟三人斷舌殺鵲而悉得瘡疾。參見〔劉宋〕劉義慶，《宣驗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365。

⁴¹ 上述三例出自〔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20，頁 151。

⁴² 附表二：「疾病敘述分類權威詞詞頻表」，請見《清華中文學報》電子期刊網頁，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68241_r3772.php?Lang=zh-tw

⁴³ 一般而言，一個詞彙在某一篇文章中出現的次數越高，即詞頻越高，則其在該篇文件中的代表性越重要。參見曾元顯於《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所編輯的「詞頻（term frequency）」詞條（2012 年 10 月），收入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辭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引用網址：<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878/>，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4 日。

各詞出現的文本篇數，最後一欄「文本分布情形」則是透過詞頻與文本篇數的比值關係，觀察權威詞於疾病文本中的分布情形。⁴⁴ 百分比愈大則該權威詞出現的文本基數較多，例如文本分布情形最高的前三名與其百分比、詞頻數與文本篇數分別為：「鼃」(80%/5/5)、「鳥」(77.00%/26/21)、「豬」(75.00%/8/7)。雖然鼃、鳥與豬三者的文本分布情形百分比相差不超過三個百分比，但結合文本篇數來看，鳥出現於 21 則文本，而鼃與豬只僅見於 5 則和 7 則，由此可見「鳥」一詞於中疾病文本中的使用情形較廣；反之，若文本分布情形的百分比越小，則該權威詞出現的文本。百分比欄中數值為 0% 代表該詞只有在一則文本中出現，例如其中詞頻數最高的是「盤瓠」(0%/10/1)，盤瓠雖在動物權威詞檔中總詞頻數排名 17，然因盤瓠一詞僅在同一則文本中出現 10 次，因此「盤瓠」文本分布情形為 0%，所以盤瓠一詞詞頻雖高但不表示該詞的使用的廣泛程度。

復次，細讀這 188 則文本，可以發現在中國中古小說當中，動物類詞彙的詞義多元，並非全都是指涉動物本身。疾病敘述文本標記出來的動物詞彙可能有以下幾種義涵：一是即動物本身，或指自然動物，可能作為人類的財產、交通工具，或指介於人類、精怪與動物之間的動物精魅；⁴⁵ 二為專有名詞，其具體指涉意涵與動物無關，有的指涉人物姓名如馬、牛、鹿、熊、龍都是百家姓中常見的動物姓氏，像是「羊孚」、「馬虔伯」、「司馬桓溫」、「石虎」等。有的則指官職，如「龍驤將軍」、「太子洗馬」。另有指涉地名，如「牧牛寺」、「牛脾山」、「烏鼠山」等；還有其他並非實指動物的複合詞，通常作為形容詞，如「犬馬」、「形如鵝子」。

⁴⁴ 「文本分布情形」的計算方式為「(文本篇數-1) ÷ 詞頻」。

⁴⁵ 由於古代中國典型的世界觀，對於人類、動物、鬼神並沒有清晰的類別界線，動物是有機整體的一部分，故在此並未將作為自然生物的動物與作為精怪鬼魅的動物區分出來。可參考〔英〕胡司德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頁 6、211。

表一：「動物」權威詞檔詞頻統計分析表

權威詞	詞頻			文本 篇數	文本分布情形		權威詞	詞頻			文本 篇數	文本分布情形	
	排序	次數	百分比		百分比	排序		排序	次數	百分比		百分比	排序
馬	1	117	16.14%	67	56%	18	騾	27	5	0.69%	3	40%	33
蛇	2	68	9.38%	33	47%	29	塵	31	4	0.55%	3	50%	21
牛	3	59	8.14%	34	56%	18	雀	31	4	0.55%	3	50%	21
虎	4	49	6.76%	23	45%	30	鵲	31	4	0.55%	3	50%	21
犬	5	44	6.07%	21	45%	30	蟻	33	3	0.41%	3	67%	8
龍	6	29	4.00%	18	59%	16	麋	34	3	0.41%	3	67%	8
羊	6	29	4.00%	17	55%	20	鶴	34	3	0.41%	3	67%	8
狗	8	27	3.72%	14	48%	28	燕	34	3	0.41%	3	67%	8
鳥	9	26	3.59%	21	77%	2	鯉	34	3	0.41%	2	33%	38
魚	10	22	3.03%	17	73%	4	兔	34	3	0.41%	2	33%	38
蟲	10	22	3.03%	15	64%	12	鷹	34	3	0.41%	2	33%	40
雞	12	17	2.34%	13	71%	5	鳩	41	2	0.28%	2	50%	21
鼠	13	14	1.93%	8	50%	21	狸	41	2	0.28%	2	50%	21
鹿	14	12	1.66%	8	58%	17	豕	41	2	0.28%	2	50%	21
獸	15	11	1.52%	8	64%	12	鶴	41	2	0.28%	1	0%	43
龜	15	11	1.52%	5	36%	37	駱駝	41	2	0.28%	1	0%	43
雉	17	10	1.38%	5	40%	33	鷓鴣	41	2	0.28%	1	0%	43
盤瓠	17	10	1.38%	1	0%	43	蝶	41	2	0.28%	1	0%	43
豬	19	8	1.10%	7	75%	3	魑	41	2	0.28%	1	0%	43
猴	19	8	1.10%	4	38%	35	山雞	49	1	0.14%	1	0%	43
驢	19	8	1.10%	4	38%	35	蝮蛇	49	1	0.14%	1	0%	43
鯊	19	8	1.10%	3	25%	41	蟾蜍	49	1	0.14%	1	0%	43
狐	23	7	0.97%	6	71%	5	獅子	49	1	0.14%	1	0%	43
狸	23	7	0.97%	6	71%	5	蜴	49	1	0.14%	1	0%	43
獺	23	7	0.97%	4	43%	32	水鳥	49	1	0.14%	1	0%	43
師子	23	7	0.97%	2	14%	42	獅	49	1	0.14%	1	0%	43
鼉	27	5	0.69%	5	80%	1	羖羖	49	1	0.14%	1	0%	43
鵝	27	5	0.69%	4	60%	14	蜘蛛	49	1	0.14%	1	0%	43
鳳	27	5	0.69%	4	60%	14							

權威詞數：57 個
總標記權威詞數：715 個
標記疾病文本數：230 則

動物詞彙發展至中古時期，其詞義指涉豐富，故透過數位工具進行遠距閱讀時，必須兼顧細讀，以辨析多元的語義。例如動物詞彙中詞頻次數最高為「馬」，共 117 次，幾乎是第二名「牛」的兩倍之多。細究其因，在古代的交通運輸、軍事活動與農事生產，馬皆佔有重有地位，且在小說敘事中，馬也經常做為交通工具出現。而姓名、官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亦常見「馬」字，「司馬氏」更是中古門閥大族。上述諸因致使「馬」一詞大量出現在中古小說當中，故「馬」詞頻雖最高，然其歧義性也最大。相比之下，「犬」(44) 與「狗」(27) 兩個同義詞的詞頻合併計算後，綜合詞頻次數(71) 躍居第二，且「犬／狗」較之馬、牛、羊、虎等鮮少被挪作姓名、官名、地名使用，標記結果大多實指動物本身，其詞頻次數較能反映實際動物在文本中的出現情形。

至於動物在疾病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則隨文本所呈顯的文化結構與依循的醫療體系而呈現不同的面貌：首先，動物可能是病者，為疾病事件的主體，牠們透過人類的醫療照護而獲得痊癒；其次，動物是致使人類生病的原因，此類又可分為正常傳染致病，如牛疫引發的傳染病，⁴⁶ 與非正常的動物精魅致病；最後，動物又可能是治癒疾病的關鍵，在中醫系統中作為醫方入藥，或是在巫醫方術的系統中，作為趨吉避凶、厭勝之術的一環，⁴⁷ 甚至動物即為治療者。為聚焦論述，下文以犬（狗）、蛇、虎三種動物為例，⁴⁸ 分析中古疾病敘述中的動物想像。

⁴⁶ 參〔劉宋〕劉義慶，《幽明錄》，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230。

⁴⁷ 如《搜神記》中所載淳于智為高平劉柔與上黨鮑瑗家卜筮之事，參見〔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3，頁 22。

⁴⁸ 第二高詞頻的動物關鍵詞「牛」，因有四則為怒特祠青牛故事異文（分別收入《新校搜神記》、《錄異傳》、《玄中記》以及《列異傳》）故事重複性高，且「牛」在小說文本中多作為交通工具、財產或專有名詞使用，而非獨立的敘事行動元，故本文依次節選犬／（狗）、蛇、虎三類動物為例分析。

在五行各方、萬物有序的知識體系下，每一物類皆有順應自然法則的生長節奏與環境。對於人類來說，動物都有其各自相應的生活空間，犬是馴化受寵的家養動物，可以出現在家屋廳堂之內，牛、馬則是勞動役使的畜養動物，大多會豢養於屋門之外，至於老虎、魚、蛇屬於非人類所能制伏、活動於山林海澤的野生動物。所以當動物出現在不屬於牠的棲地，或是人離開日常生活的空間，此類規界一旦破除，即為失序的前兆，預示著疾病災禍的到來。

從圖六犬、蛇、虎與空間權威詞的共現圖來看，犬、蛇、虎在疾病文本中出現的空間可概分為兩大類，一是山、河、淵、海、江、山、樹、穴等山林野外空間，另一則是家、屋、郡、縣、戶、里、床、樓

目前／總關係數：48／48。

目前／總節點數：3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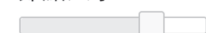
關聯強度 [2 ~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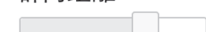
詞頻強度 [2 ~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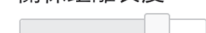
節點大小：14.4



群間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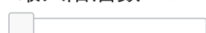
關係距離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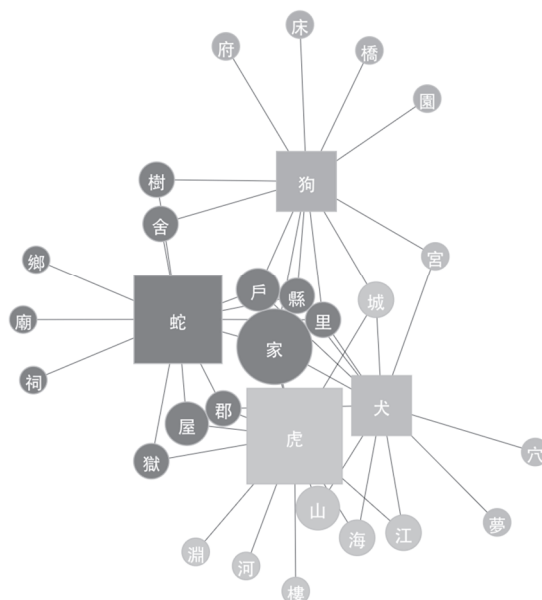
縮放大小



最大階層數：1



搜尋過濾



圖六：犬、蛇、虎與「空間」權威詞共現圖

等人類社會的群居空間。疾病事件發生的空間，與動物的分類屬性及其活動場域有高度的關聯性：犬狗既是家養動物，與之關聯的空間詞彙，便為宮、城、床、府、橋等人工建築，意謂著犬狗與人類生活的密切相關，就此而言，家養動物的生活空間與其相關敘事發展，常與人類的活動範圍與情節趨向相近；反之，蛇、虎共現的空間詞彙，一半連結的是社會空間，另一半則是山林野外空間，意謂著野生動物的入侵，或人類離開日常生活空間，進而引發非常態的疾病或傷害。藉由動物與空間權威詞的共現，可以觀察到兩種空間異質化引發的疾病事件，一種是人離開日常環境至特殊場所的空間異質化，另一種則是異物入侵日常生活環境而導致空間的異質化。

首先，人離開平常生活環境，也就脫離了人文化空間對個體的日常保護。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無論遠近的出行都是非常之事，離開日常空間便增加不確定的危險因素。如李建民考察傳統醫學中，祟病發作原因之一即與患者曾經至山林、墳場、空房、人跡罕至等鬼神精魅的活動場所有關。⁴⁹ 江紹原亦指出精魅作祟的能力有些會受到空間的影響，當人們進入精魅的生活領域時，便有機會為其所加害。⁵⁰ 人與動物雖然皆稟天地陰陽之氣化生，然仍受血肉形軀的限制。在異常空間之中常使邪氣可趁隙可入，或受到精魅邪祟，疾病便由此而生。因此，一旦人們離開自己的空間，就是脫離以自己為中心所構成的保護圈，包括祖宗、土地、家神等護佑，人身的保護與防禦力也隨之降低。

職此，諸多志怪故事的開頭都是從空間異質開始，諸如行旅、遷居、採集、捕撈或狩獵，使人類離開熟悉的居住地，造成空間異質化，

⁴⁹ 李建民，〈祟病與場所：傳統醫學對祟病的一種解釋〉，收入林富士主編，《疾病的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頁23-76。

⁵⁰ 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側重其法術的和宗教的方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58。

容易遭致異類攻擊。如孔子絕糧於陳，同行者病弱體虛之氣遂招引醜魚精的覬覦；⁵¹ 又如前引張奮宅，賣與程家，程舉家死病相繼。⁵² 中國傳統對於捕獵等帶有越界入侵、甚至危及生靈的行動，常懷抱著一種感恩護生、自我節制的潛規則，最顯著者如晉元帝時吳郡士人陳甲的故事，其闖入他類棲息的生活空間，獵於東野大藪，遭遇五色玄黃、大如船隻的大蛇，在既無傷害、又無益生計，更無防備的沉醉狀況下，才被入侵的陳甲趁隙獵殺，甚至連誰下的毒手都茫然無知。⁵³ 動物精魅物老成精，雖有變化人形等非常能力，但仍然會受原形的侷限，在特殊條件和情境下方可轉化。⁵⁴ 故事延續到三年後，陳甲重遊故地，追憶往事，大蛇才有復仇的機會，當夜便以人形向陳甲興訴殺身之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夢」，其亦為志怪中重要的異質空間，透過夢的他界空間，人與動物皆能脫離血肉形軀的束縛，而人神鬼怪也突破陰陽兩界的阻隔，故鬼神精魅能親近人身。是以夢往往成為人神鬼怪感應相通的交會點，得使在現實世界受限於物類之別，無法說出口的恩澤與傷害，在夢境得以實現，並作用到現實世界中。

另一類的空間異質化，則是外物入侵。若說家作為人類安居存在的空間，形成「中心—四方」的神聖空間，⁵⁵ 一旦破除了中心的防衛，原來安穩神聖的家屋空間遂滲入死亡的陰影。例如《幽明錄》載：

⁵¹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19，頁 148。

⁵² 見〔魏〕曹丕，《列異傳》，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119。

⁵³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於東野大藪，歛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陳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日，腹痛而卒。」〔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20，頁 155。

⁵⁴ 林富士，〈釋「魅」：以先秦至東漢時期的文獻資料為主的考察〉，收入蒲慕州主編，《鬼魅神魔：中國通俗文化側寫》（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128。

⁵⁵ 參見潘朝陽，〈「中心—四方」空間形式及其宇宙論結構〉，《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 23 期（1995 年 3 月），頁 85。

新塋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聞牀前狗鬪，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只見一死人頭，在地猶有血，兩眼尚動，其家怖懼，夜持出於後園中埋之。明旦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旦已復出，乃以磚著頭令埋之，不復出。後數日，其母遂亡。⁵⁶

在所有動物裡面，狗是與人類最親近的動物，很早以前人類就有畜養犬狗的紀錄，⁵⁷ 狗既可進入家屋保護中心，又能向外抵禦攻擊的動物，胡司德即指出狗處於居家和野生之間，介乎內外之際，所以狗總是與住宅的門檻發生聯繫。⁵⁸ 在疾病敘述中，狗吠往往警示家中有將有災難發生。如庾謹兄弟所聽見的狗鬪聲，無形中彷彿有所入侵，卻在激烈的打鬥中得以防衛；然出門視之，唯見一死人頭在地，兩眼猶動，仍有一絲生氣。儘管死人頭血腥可怕，埋而復出，庾母病寢之身尚可續命，一旦長掩不出，不消數日，庾母遂亡。

綜言之，從動物與空間的共現情形來看，疾病敘述往往發生在人類和動物生活空間的交錯往來之間。當人類遠行至陌域，或異物入侵家屋之際，容易因空間的異質化而引發疾病事件。

就動物在疾病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動物致病實為大宗，其中固然包括正常的禽畜疾疫傳染，然中古小說中最常見的動物致病敘述，還是一如歷史文獻所顯示，乃為由動物精魅致病的非常現象。⁵⁹ 動物精魅通常具有會說人語、能幻化人形、預言等異於常態的能力，⁶⁰ 從犬、蛇、虎與神怪的權威詞檔共現圖來看，神、鬼、物、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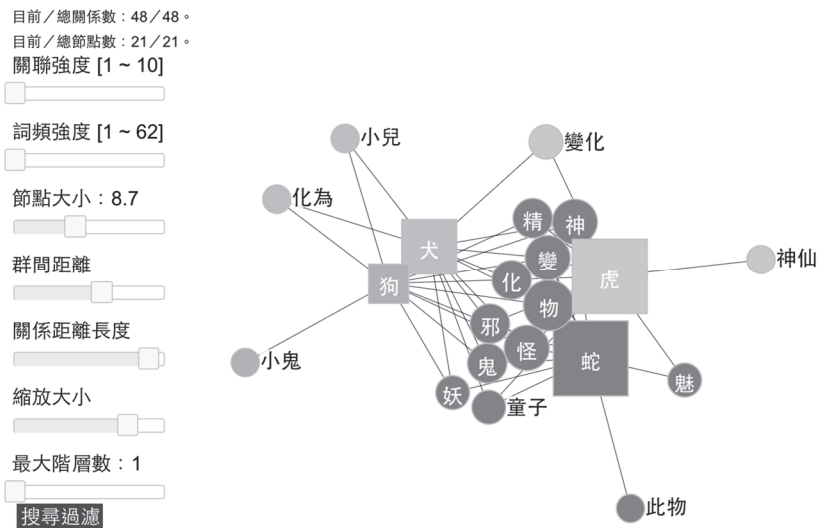
⁵⁶ [劉宋] 劉義慶，《幽明錄》，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261-262。

⁵⁷ 關於中國的蓄犬傳統可以參考 Olivia Milburn, "Confucius and His Dog: Perspectives on Animal Ownership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and Philosophical Texts," *Chinese Studies* 29(2011): 289-315.

⁵⁸ [英] 胡司德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頁 294-297。

⁵⁹ 林富士，〈釋「魅」：以先秦至東漢時期的文獻資料為主的考察〉，頁 109-134。

⁶⁰ 《睡虎地秦墓竹簡》：「□鳥獸能言，是夭（妖）也，不過三言。」參見劉樂賢，《睡虎地秦



圖七：犬、蛇、虎與「神怪」權威詞共現圖

精、妖等詞常與動物詞彙共現出現，反映了中古時期動物與精魅、鬼怪難以界分的生命觀。

然而動物僅是精魅（妖怪、精怪）的形體之一，鬼神精怪遍在萬物之中，其原形亦可為山川、水澤、植物、礦物、器物等。⁶¹ 正如《搜神記》載孔子絕糧困陳，中夜絃歌於館，忽有黑衣人襲擊並挾持子貢。後孔子察其破綻，讓子路順利擊退之，而黑衣人也變成九尺長的大鯢魚。孔子為眾人解釋妖怪成精之理：

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227。葉慶炳將妖精定義為「凡是人類之外的動物、植物或器物而能變化為人，或雖未變化為人而能言語與人類無異者，謂之妖精。」參葉慶炳，《談小說妖》（臺北：洪範書店，1983年），頁3。謝明勳於葉慶炳的基礎上，補上妖精「隱形」、「預知」的能力，詳參謝明勳，《六朝小說本事考索》（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44-45。

⁶¹ 參考林富士，〈釋「魅」：以先秦至東漢時期的文獻資料為主的考察〉；以及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53-179。

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為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⁶²

此則依托孔言，闡明物老成精的精魅觀。志怪小說中還有許多介於「物」與動物之間的精魅，⁶³ 借用已知的動物分類，指稱尚未賦名別類的精怪。「有一物，似牛」、「有物類猴」、「有物若豕，赤色」，此類志怪異語提醒著我們在人們所認知的常識秩序中，還有尚待上架編碼、為人所識別的未知「物」。⁶⁴

至於不同物類之間何以能變形轉化，干寶則在《搜神記》卷十二敘其原理，其以五氣清濁、節氣時序論天地萬物之形性變化：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思；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各從其類也。……；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鳩變為鷹：時之化也。……雀之為鷹也，蜚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

⁶²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19，頁 148。

⁶³ 「物」一詞在先秦特指某一範疇的超自然存在，除了明確是動物形體的精怪之外，在中古小說還有許多形似動物的物怪，以「有一物，似……」，「有一物，若……」等句式出現在文本中。關於「物」的研究可參考杜正勝，〈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1）〉，《大陸雜誌》第 104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3。

⁶⁴ 在「動物」與「神怪」權威詞檔共現中，「物」一詞為總共現段落數最高，共 29 次，其次依序為「神（28 次）」、「鬼（24 次）」、「怪（27 次）」、「精（15 次）」。

若此之類，不可勝論。⁶⁵

萬物同稟天地之氣，陰陽、四時、五行構成宇宙自然、社會人事的運行法則，空間、時間與物類在透過同類、同聲、同氣的關係，而能相互召合感應。至少在戰國時期，自然、社會、人已被涵攝在由陰陽四時五行所編整組織的宇宙圖式中，構成古代中國知識體系與思想世界的理解框架，並且應用於禮俗制度、祈福禳災、人身醫學、生活日常等實用技術，直到近代西方思潮以前，它一直都是古代中國思想世界的潛在背景。⁶⁶ 是以物類之間雖有屬性形質之殊異，但也可以透過精氣的轉介流動而跨類變形。精氣的屬性、清濁、和異，空間的方位、燥濕、實虛，時間的節令、時序、朝夕都會影響物類的成形與變化。⁶⁷

如同圖七所見，與神怪權威詞高度共現的另一組動詞詞組「變、化、化為、變化」，物類跨類的變化亦可發生在人類身上，可能是精怪修練而幻化為人形，另一重的變化則是人由倮蟲之長降轉為動物，如中古疾病小說分別記載三則人因病而形體變易化成老虎的故事。第一則是干寶《搜神記》卷十二提到當氣亂之時，可能會發生超乎常態的物類變化，例如牛哀得疾，七日化虎而食兄。其文曰：

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為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啟戶而入，搏而食之。方其為人，不知其將為虎也；方有為虎，不知其常為人也。⁶⁸

⁶⁵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12，頁89-90。

⁶⁶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10-216。

⁶⁷ 李豐楙，〈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一個「常與非常」觀點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頁287-318。

⁶⁸ 此則故事參見〔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頁90。《搜神記》所記載的牛哀化虎故事首見劉安〈俶真訓〉；又見王充〈無形〉、〈論死〉、〈遭虎〉；曹植〈辯道論〉、張衡

牛哀化虎，其形類改變，性情亦變，在喪失心志的狀況下，在家中吃了自己的兄長。牛哀不僅因為疾病失去了人形，還失去了人性；更甚者，失去了社會親倫（食兄），更失去了自我（不知其常為人）。牛哀故事闡述氣亂變化之理，疾病生死難測的事例，強調神與形變，虎形與人形、獸性與人性不可並存的事實。

第二則是《述異記》所錄，南康營民任考之禽殺妊猴，是夜夢神人責讓之，而發狂成虎，「後考之病經旬，初如狂，因漸化為虎，毛爪悉生，音聲亦變，遂逸走入山，永失蹤跡。」⁶⁹ 與上則牛哀化虎而食人不同的，則是任考之是在具有人身之時做出禽獸之行，對臨產母猴趕盡殺絕，而受到夢中神人的懲罰，最後病狂漸變成虎，可見任考之因為沒有人性而喪失了人形。

第三則化虎故事收於《齊諧記》：

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年二十二。少來了了，忽得時行病，差後發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猶多劇，忽失蹤跡，遂變作虎，食人不可復數。後有一女子，樹下採桑，虎往取食之。食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間。後還作人，皆知取之。經一年還家，復為人。遂出都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詢自云：「吾昔曾得病發狂，化作虎，噉人一年。」中兼道其處所姓名。其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

〈思玄賦〉；與葛洪〈論仙〉。見〔西漢〕劉安著，劉文典校釋，〈俶真訓〉，《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2，頁47。〔西漢〕王充著，黃暉校釋，〈無形〉，《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冊1，卷2，頁61-62。〈論死〉，冊3，卷20，頁873；〈遭虎〉，冊3，卷16，頁709。〔魏〕曹植著，〔清〕嚴可均輯，〈辯道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18，頁1152。〔東漢〕張衡，〈思玄賦〉，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15，頁662。〔東晉〕葛洪著，王明校釋，〈論仙〉，《抱朴子內篇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13。

⁶⁹ 參見〔梁〕任昉，《述異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164。

弟者，於是號哭；捉以付官。遂餓死建康獄中。⁷⁰

《齊諧記》的虎變故事仍保留「虎是山林之獸，食人於野」的故事母題。⁷¹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薛道詢在變化為人形後，不僅回去取被食之女藏在山石釵釧，並記得當初發狂食人之處所姓名，可知薛道詢在人／虎的形體轉換中並未失去其神識記憶，並以人身／虎形、狂走／監禁、食人／餓死，藉由敘事的二元結構，對照獸形與人形兩種型態。

綜觀上述三則故事，三人化虎背後的原因皆不相同。牛哀是氣化感應中氣亂、反序造成倮蟲轉降為毛蟲，任考之則是鬼神報應，薛道詢則是百藥不治，服散後狂亂失序的人身轉換。此外，對於形與神看法，《搜神記》認為形變神亦變，《述異記》則是人性泯滅後失去人形，《齊諧記》人形／虎形皆保留其神識（人性／獸性）。三則故事對於形與神看法各有異趣，這也是另一種隱含在小說文類中的人禽之辨。雖然如此，人類與動物皆同由精氣化生，故可相互轉化，構成三則人身化虎故事的共同基礎。

在疾病敘述文本中，還有一類疾病的解釋，認為傷害殘殺動物將導致精怪復仇。特別是中國以家族為核心的人際網絡，使得動物精怪的復仇對象，擴及至加害者的家人、甚至後代。⁷² 有待觀察的是，如圖八所示，在犬、虎、蛇三種動物中，蛇與共現權威詞所形成相當特殊的群組關係。自古以來，蛇的象徵最為複雜，野居時代，人民常遭受出其不意的攻擊，或為致命的毒液所害，而被視為威脅，⁷³ 進而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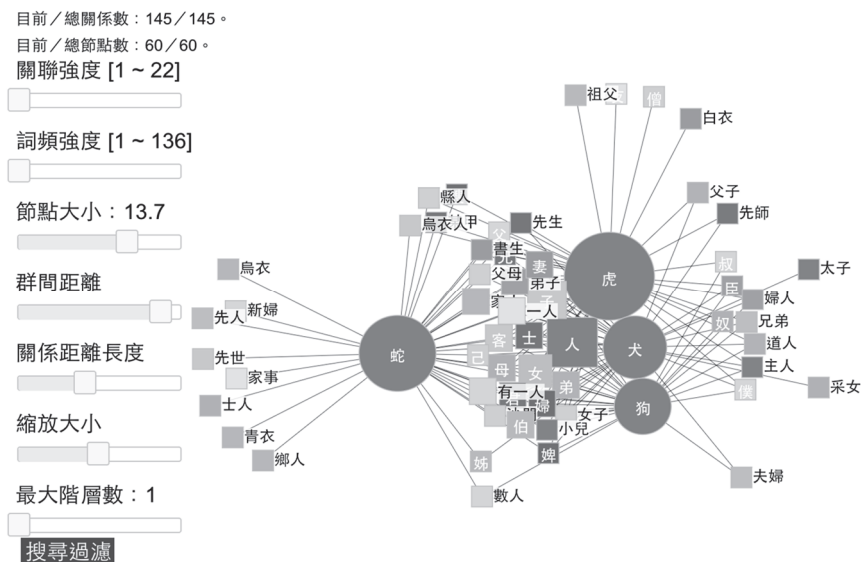
⁷⁰ 〔劉宋〕東陽無疑，《齊諧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192。

⁷¹ 〔西漢〕王充著，黃暉校釋，《遭虎》，《論衡校釋》，冊3，卷16，頁710-711。

⁷² 相關論述可參考〔美〕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著，張珣譯，〈文化建構病痛經驗與行為：中國文化內的情感與症狀〉，《思與言》第37卷第1期（1999年3月），頁255-256。

⁷³ 如《說文解字》解釋蛇的本字「它」曰：「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蛇，或从虫。」參見〔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1999年），頁684-685。

伸為報復、恨意的象徵；而《詩經·小雅·斯干》則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⁷⁴ 又以其陰濕柔軟，而將夢蛇為生女子的吉兆；伏羲女媧的蛇尾交纏則更關乎生命的起源與創生能量。⁷⁵ 是以在西方也因其蛻皮，而作為再生、轉化、不朽的象徵。⁷⁶ 在中古小說的脈絡中，亦可見其與家族的關係最為密切，多與先人、先世、新婦、家事等詞共現。如揚州別駕顧球姊出生十歲便生病，至五十餘歲時，請郭璞占筮得大過之升。顧球尋訪家事，方知祖先曾伐大樹，得大蛇而殺之。換



圖八：犬、蛇、虎與「人際關係」權威詞共現圖

⁷⁴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小雅·斯干〉，《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影印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本），冊2，卷11上，頁387上。

⁷⁵ 較詳盡的論述，參見陳雅雯，〈蛇的原型意象研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20期（2013年12月），頁111-146。

⁷⁶ 根據維若尼卡·愛恩斯（Veronica Ions）指出，蛇每年至少換皮一次，蛻皮具有更新及再生的意義，故具有轉化及重生的象徵意義。見〔英〕維若尼卡·愛恩斯著，杜文燕譯，《神話的歷史》（臺北：究竟出版公司，2005年），頁58。

言之，先祖殺死精怪的罪業，以疾病方式加諸於家族後代身上，而一人患疾即可致使家庭煩憂困擾，乃至家族的失衡。郭璞的卦辭「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⁷⁷ 亦如 Chris Shilling 定義疾病時提到：「疾病或不適不完全是由有機身體內在的程序所決定，同時也被產生這些經驗的多種身體環境與健康和疾病的文化意義所形塑。」⁷⁸ 一個文化的觀物模式、集體記憶與生活世界也會影響個體如何去定義、解釋、治療身體的疾病。是以物老成精、精怪復仇的觀念，結合中國以家族為核心的文化，以及中古方士術數的醫療體系，顧球姐之病於郭璞占筮後，被嵌入一個更廣大的意義系統與文化脈絡中，成為祖先罪愆的一種符號象徵，召喚家族鄰里的情感記憶，解釋了當初各個怪事異象所以然之因。

除了動物精魅致病的解釋疾病成因之外，復有另一種動物致疾的病因想像，也即是動物侵入人身而引發的病痛。如《搜神記》載淮南書佐劉雅夢見青刺蜴，從屋落其腹內，從此苦於腹痛病。⁷⁹ 而在進入人身而致病的動物中，又以蛇最為常見，其陰濕幽暗的生物習性適與疾病的成因相符，細長身形與鑽洞習性則易與出入人體孔竅產生聯想。如《搜神記》卷十七蛇入秦瞻腦的故事，⁸⁰ 敘述者非以視覺，而

⁷⁷ 「揚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跡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群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見〔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3，頁23。

⁷⁸ 〔英〕克里斯·謝林著，謝明珊、廖珮如譯，《轉變中的身體：習慣、危機與創造性》（新北：韋伯文化國際，2013年），頁148。

⁷⁹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10，頁75。

⁸⁰ 「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覺哄哄。僅聞其腦間食聲啞啞，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巾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17，頁134。

是以嗅覺先聞其臭，甚至是「身體內」的觸覺（盤其頭中）與聽覺（食聲啞啞），形容進入腦中的蛇，充分展現了異物入侵人身所造成的不適感。

動物入身的病因觀，有別於變化無常、漫無邊界的傳統病因——「風」，⁸¹ 動物具體有形，一旦入身則致病，卻可出則疾癒。《搜神後記》見錄〈莖蕨化蛇〉一事：

太尉郗鑒，字道徽，鎮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淡淡。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出一赤蛇，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掛著屋檐前，汁稍稍出，蛇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一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⁸²

郗鑒底下的一甲士，在二月中草木萌動的時節出獵，摘食一莖蕨導致心腹疼痛，半年後吐出一條尺餘的赤蛇。經過一宿，蛇漸漸焦小脫水，原是過去所食莖蕨。有趣的是，在這則故事中結合了出行導致空間異質化的危機，同時類應宇宙中時令與物候的連動關係，以及同類相生變化的變形思維。⁸³

綜上所述，將身體的不適感與疾病的成因想像為動物出入人身，是中古時期感知、描述疾病的類推來源域之一。此類進入人身的動物，不若動物精魅具有人性或是特殊能力，其所強調者乃是動物作為能動的異物，描述入侵人體的身體感。⁸⁴ 動物入身的病因觀，亦隱喻疾病

⁸¹ 詳參〔日〕栗山茂久著，陳信宏譯，《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臺北：究竟出版公司，2001年），頁269-277。

⁸² 〔宋〕陶潛撰，李劍國輯校，《搜神後記》，冊下，卷2，頁490-491。

⁸³ 桫欏樹（學名：*Cyathea spinulosa*），又名筆筒樹，為低海拔樹蕨，因其莖幹筆直，老葉枯萎脫落後會在莖幹留下狀似爬蟲鱗片的葉痕，形似巨蟒故別名蛇木。參見李瑞宗，《植物地圖：臺灣低海拔植物生態》（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2000年），頁124-125。

⁸⁴ 「（身體感）……它是人體感官覺受的一種整全並且是連動的完形表現，例如，對於衣服與

的外來性與完形性，當疾病獲得治療後，病人即可痊癒，生命可以回到疾病發生以前的狀態。是故，此類疾病事件所牽涉到所關涉到人際網絡範圍也比較小，多以患者自身為主。

此外，在中古的厭勝和巫醫醫療系統中，或以強力鎮壓、逼迫、排除等方式使妖邪屈服而取勝，或以模擬、浮顯、轉移、甘願等替代方式來解除，⁸⁵ 而動物也常是治療人類疾病的關鍵之一。如張劭母親病篤，淳于智讓張劭至西市買獼猴繫在其母臂上，且不斷讓牠發出聲音，試圖混亂母與猴的身分，成為張母病氣所附的替身，三日後放去。張劭依淳于智之言，三天後作為宿主的獼猴甫離家門，便為惡犬所嚙，暴斃而亡，而張劭母親的病也痊癒了。⁸⁶

當動物在厭勝之術或巫術治療中作為治癒疾病的關鍵，有賴於巫醫、方士等「知人所不能知」博識人物的提點，⁸⁷ 並透過某些儀式性的治療行為，方能達到治癒疾病的效果，其所突顯的是協調者之神異與醫病方法之奇特。又如華佗醫治劉勳女，當時河內太守劉勳的女兒左膝上有一暗瘡，癢而不痛，數十日便發作，如此反覆已七八年。劉勳求醫於華佗，華佗便取一頭稻糠色黃犬，以繩繫犬頸，以二匹馬牽

纖維的身體感，包括了有濕潤感，溫度感、觸覺感、視覺感知、聽覺感知、安全感、遮羞感等整體感覺。……人與外物同時具有潛在主動性，雙方在碰觸的那一刻同時激發出對彼此的聲響。」張珣，〈物與身體感理論：以香為例〉，收入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64。

⁸⁵ 所謂「厭勝」，可以指以強力鎮壓、逼迫、排除、使之屈服而取勝的意思；亦可解釋為平安的克服困難，順遂勝利。厭勝的目的主要為「祈福避禍」。而實行厭勝之術的時機與目的主要有疾病、水災、火災、生育、權位、戰爭、謀殺七種。詳參林富士，《小歷史——歷史的邊陲》（臺北：三民書局，2018年），頁128-146。另可參看張珣於〈道教「祭解」儀式中的懺悔與「替身」：一個文化心理學的探討〉一文整理出道教祭解儀式中「替身」的四種作用：模擬、浮顯、轉移、甘願，張珣，〈道教「祭解」儀式中的懺悔與「替身」：一個文化心理學的探討〉，收入余安邦主編，《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倫理化的可能探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年），頁409。

⁸⁶ 故事見〔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3，頁22-23。

⁸⁷ 參見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之「博識人物」試論〉，《六朝小說本事考索》，頁1-62。

著黃犬走三十里，直到黃犬走不動，再讓人以步行拖曳五十里。同時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華佗續之，其文曰：

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⁸⁸

華佗以犬腹剖面靠向劉勳女左膝瘡口，竟能引出一條長三尺許有眼窩但沒瞳孔的蛇。反向生長的蛇鱗，不禁令人聯想劉勳女病灶發作時「癢而不痛」的徵狀，生動模擬逆鱗的蛇於左膝內穿梭爬行的感覺。華佗藉由劇烈運動、行氣血熱的黃犬腹肉引出劉勳女膝中的冷血的蛇，蛇既出而亡，病亦痊癒。

在同類相應的宇宙思維中，物類與物類之間存在著彼此相勝相剋的法則，博識人物，或為醫者、或為方士、術士見微知著，通達世間萬物秩序則揆知物類之間的生勝之理與禳除招致之法。對於無法探知的宇宙自然或是難以預測的吉凶禍福，方伎之術、博物之學、氣化類應等是古代社會認識世界的基礎。在物類相感的宇宙觀下，物物之間有不可知的牽引連動。然而，這些從上古巫覡方士流傳下來的知識與技術，隨著儒家取得知識的解釋並佔據上層社會的權力中心時，被邊緣化成為特定的、經驗的奇士異術。於是這些厭勝禳災雖有深層的思想依據與體系，但卻缺乏明確的組織結構使之合理化。⁸⁹ 對未解其術的時人來說，華佗、淳于智去脈絡化的方術巫醫治療即是常識之外的「異」。⁹⁰

⁸⁸ 見〔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3，頁26。

⁸⁹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頁349。

⁹⁰ 六朝志怪之疾療思維可參看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171-224。

圖九犬、蛇、虎與「疾病結果」共現圖最後從疾病事件的結果來看，圖九雖以「死、亡、卒」等死亡結局為核心。然透過厭勝治療或是致病病因的排除，仍可見患病之後痊癒的一線生機。只是病癒的表達方式多元，包括：「復生」、「病愈」、「乃蘇」、「初差」、「痊」等，往往分散於共現圖外緣四周，不若生命終結「死、亡、卒」之表述單一而集中。

綜合本節所論，就動物與空間的權威詞共現結果來看，疾病事件往往發生在空間異質化的非常時空，包括人離開日常環境，或是異物入侵日常生活等兩種情況。而動物精魅致病，以及動物入身，則是中古小說中常見的病因解釋；然另一方面，動物也往往是治療人類疾病的關鍵之一。換言之，在巫道醫雜然不分的醫療體系中，與精怪、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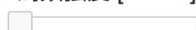
目前／總關係數：27／27。

目前／總節點數：19／19。

關聯強度 [1 ~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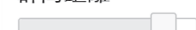
詞頻強度 [1 ~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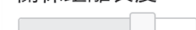
節點大小：8.0



群間距離



關係距離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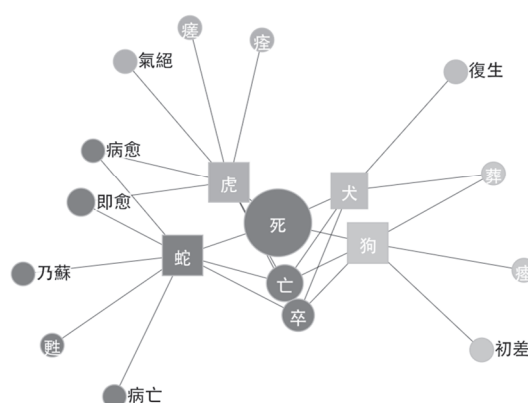
縮放大小



最大階層數：1



搜尋過濾



圖九：犬、蛇、虎與「疾病結果」權威詞共現圖

神共處的世界觀下，動物跨界與跨界動物乃是形塑中古疾病文化不可或缺的要害。於動物精魅故事中，側重的是動物的習性，以及人類關係的親疏遠近；而動物入身的病因觀則側重動物的質地與體感；至於動物厭勝治療則著重動物的屬性之勝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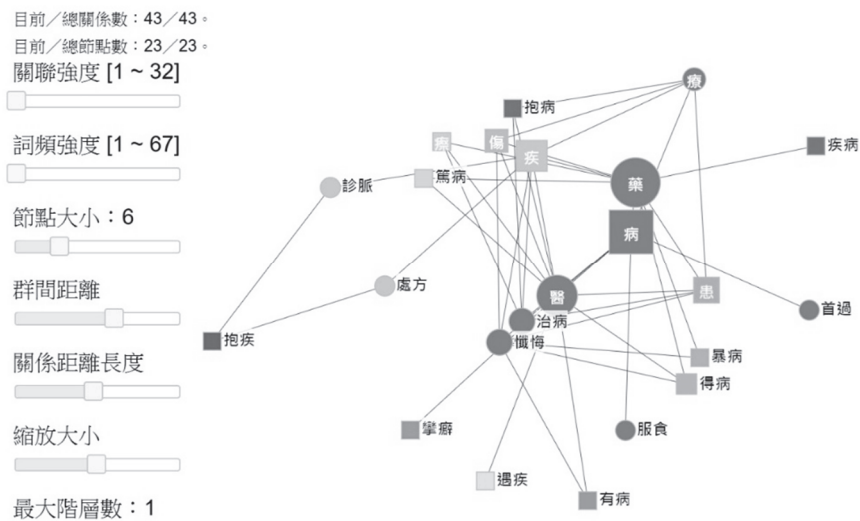
五、疾病敘述與醫藥關懷

誠如上節所述，當疾病事件發生時，尋求治療，用以消解病痛和死亡，實為當時面對疾病的一種重要方式。透過圖十，可以發現中古小說中的人們多會選擇以俗世醫學所代表的醫與藥介入。若將描繪「疾病事實」的權威詞依照病症輕重分類，進一步觀察其於治療方式的差異，可以看到無論是中性描繪疾病發生的詞組（如：疾、病、傷、患、抱病、抱疾、有病），或是呈現急症者（如：暴病、暴疾），皆會與「醫」、「藥」產生連結，換言之，縱使面對來勢洶洶的急症，其痊癒與否的關鍵也在於能否找到對症藥物，如《幽明錄》中張甲感染乾霍亂，因無人知曉藥方而卒，其後蔡謨得張甲托夢，知曉藥方後成功救治感染同樣疾病的患者，⁹¹ 可知時人面臨疾病威脅，無論病情輕重，首先想到的便是尋求醫藥救治，展示此時期對於醫藥的信任。因此故事中的角色遇到疾病事件，尋醫問藥便成為直覺性的反應，即使如《搜神記》中的神異故事，當隋侯見到路旁已斷成兩截的大蛇，在不忍人之心下還是命人以藥物封住蛇身上的創傷。⁹² 由此可見，在創傷醫療中，敷藥包紮已經成為一種處理慣例，也具有相當成效。

在此情形下，便以醫、藥為專題，進一步觀察其在疾病事件中的關連情況。將醫藥與全部的疾病關鍵詞進行共現，其中共現段落數最

⁹¹ 〔劉宋〕劉義慶撰，《幽明錄》，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218-219。

⁹² 參見〔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20，頁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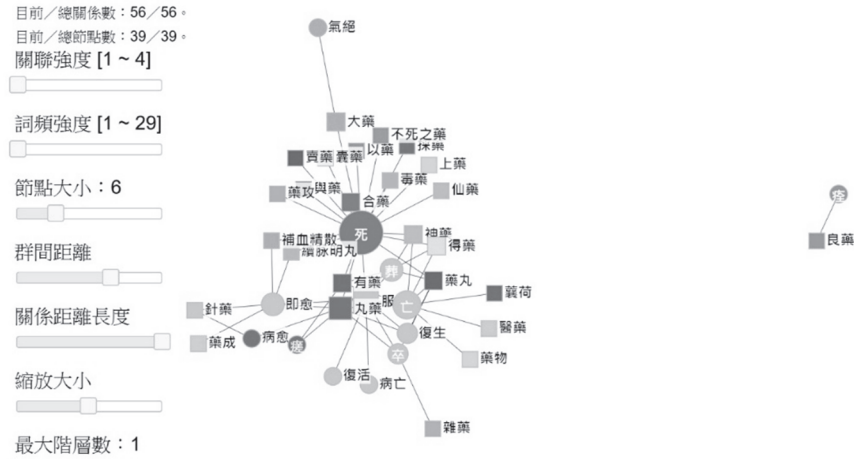


圖十：「疾病事實」與「疾病治療」權威詞共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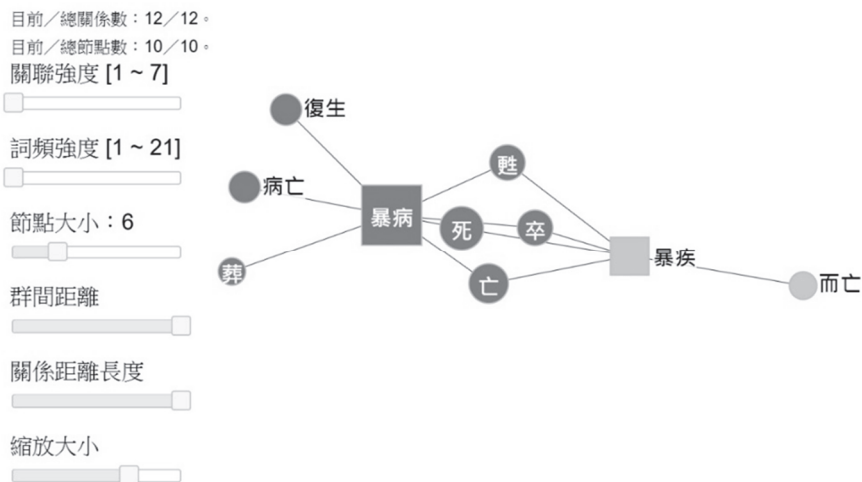
高者為：病（24 次）與死（20 次），由於此二者皆是標誌疾病結果的關鍵詞，故先觀察醫藥介入疾病事件後所產生的結果，此部分可透過圖十一進行觀察。

醫藥與疾病結果的共現圖中，出現頻率最高者為死、亡這兩種負面結果，且「死」、「亡」二者處於共現圖的中心位置，「葬」、「卒」、「病亡」等關鍵詞則環繞於外，再檢視疫（15次）、癘（7次）、瘟（包括溫，共0次）和癩（包括病癩，共9次）等字頻，可看出小說世界中，疾病往往籠罩在濃厚的疫病死亡陰影之下，此種現象應與東漢至六朝晚期接連出現的疫癘有關。⁹³

⁹³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頁3-28。



圖十一：「醫藥」與「疾病結果」權威詞共現圖



圖十二：「疾病事實—暴疾、暴病」與「疾病結果」權威詞共現圖

此一背景固有助於解釋圖中關鍵詞的趨勢，但仍須考慮魏晉南北朝小說本身具有怪異非常的性格，病亡常成為此界與彼界的交界點，許多冥遊、仙遊者都曾歷經病亡階段，著名者如劉薩荷暴病而死，方

才展開遊冥；⁹⁴ 又如賀瑀得疾，死三日，吏人將上天遊歷，最後取印而返，成為社公。⁹⁵ 透過圖十二，可以發現「疾病事實」權威詞中，用以描繪病情迅猛的「暴病」與「暴疾」，不僅與表示死亡的語彙緊密相依，又會連結至「復生」、「甦」這類表述死而復生的語彙，可知在疾病文本中，暴病／暴疾而亡的情節，往往是連結現世與他界的樞紐。故事中的主人翁歷經非常的遊冥經驗後，多半肩負起傳遞冥界訊息重任而返回人間，特別是有關修持善行、懺悔罪愆之事，如《冥祥記》中的李旦在冥府中受人所託，轉知亡者囑託家人為其懺悔求福；⁹⁶ 又如唐遵於地府收到叔父的款款叮嚀，告以受法持戒、深勤善業之功。⁹⁷ 因此，疾病並非僅關乎生理健康的問題，也往往受到超自然的介入，成為一種徵象，甚至一種管道。

再回頭觀察圖十一，說明疾病與藥物施用的「服藥」與「丸藥」的共現現象。事實上在小說世界中，疾病療癒的比例遠遠低於死亡結局者，但絕不能僅從單一數據，否認當時多有藉由藥物而痊癒的實例。換言之，疾病固然與死亡緊密相依，但同時也會連結到「即癒」、「病癒」、「復活」、「復生」這幾項正面結果，可以看出此時期的疾病即使被死亡陰影所壟罩，但在藥物介入後，不僅可能出現否極泰來的轉折，甚至伴隨著神異情節的發生。故在小說文本中，時常出現角色於瀕死之際得到藥物救助，或是得藥死而復生的情節，然此種服藥後立即得到治癒的情節，多半具有濃厚的宗教成分，亦即藉由鬼神或僧人、仙人給予藥物，如《神仙傳》中死亡三日的杜變，服用仙人董奉給予的藥物後旋即復生；⁹⁸《冥祥記》中趙習纏綿病榻，得神人賜藥，始得

⁹⁴ 〔梁〕王琰，《冥祥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506-508。

⁹⁵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15，頁 112。

⁹⁶ 〔梁〕王琰，《冥祥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425-426。

⁹⁷ 〔梁〕王琰，《冥祥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399-400。

⁹⁸ 〔晉〕葛洪著，胡守為校釋，《董奉》，《神仙傳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卷 10，頁 333-334。

痊癒。⁹⁹ 此類故事中的醫藥，雖然被賦予屬於仙尊神佛的超自然力量，然而作為實際治癒疾病的媒介，醫藥在此間仍佔有極大的重要性。於此同時，亦可觀察到另一顯著趨勢，藉助醫藥促使疾病得以痊癒者，其治療方式多為俗世醫療的「針藥」，再次展現中古時期的醫療已具有相當成效，並反應出時人對於醫藥的信任感，只是這些醫藥妙術未必進入世間的知識體系，為人所充分掌握，而常帶有神異色彩。

進一步觀察中古時期的疾病在醫藥介入後，一旦產生痊癒、乃至於死而復生的正面結果，會於此種轉折中將會產生何種情緒變化？而宗教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便成為接下來想要觀察的方向。透過圖十三，可以看出醫藥進入疾病事件後，所呈顯的情緒以苦、哀、憂、喜、怒、懼、悲為主。就整體來說，疾病與人最直接的感受便是痛苦的，無論是病者親身所感受者，如《宣驗記》中孫皓身患隱疾使其苦痛欲死、¹⁰⁰《拾遺記》中鄧夫人面頰受傷之際所感受的痛楚，¹⁰¹乃至於身旁照顧者對病者能否痊癒、或是尋醫無果時所顯現的憂思愁苦，在在顯示此種橫互整體疾病事件中的主要情緒。

進一步聚焦於醫藥與疾病情緒權威詞共現詞頻最高的「服藥」與「合藥」二者，其中與「服藥」產生共現者，為怒、憂、苦、恐、悲哀、懊恨等情緒；與「合藥」共現者則是苦、懊恨、怒、憂念、恨。憂慮和恐懼與藥物之間的關係緊密，展現人們面對疾病不得醫治時的擔憂與恐慌，故而企盼藥物的治療，因此共現圖中與此二者相關的詞彙，多與「服藥」、「丸藥」產生連結。如《搜神記》中顏含嫂因疾失明，苦於無法得到蚺蛇膽合藥，為此含憂累歎；¹⁰²又如《神仙傳》中

⁹⁹ 〔梁〕王琰，《冥祥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439。

¹⁰⁰ 〔劉宋〕劉義慶，《宣驗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366-367。

¹⁰¹ 〔晉〕王嘉撰，〔梁〕蕭綺錄，齊治平校注，《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89-190。

¹⁰²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11，頁 82。

誤診之憾。105



圖十三：「醫藥」與「情緒」權威詞共現圖

為顯著。如彭祖所言之養壽之道，文中的服藥便同時與憂恚、悲哀、

¹⁰³ 〔晉〕葛洪著，胡守為校釋，〈李八百〉，《神仙傳校釋》，卷3，頁81。

¹⁰⁴ 〔晉〕葛洪著，胡守為校釋，〈趙瞿〉，《神仙傳校釋》，卷7，頁253。

¹⁰⁵ 〔劉宋〕劉義慶撰，《幽明錄》，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218-219。

忿怒三種情緒產生共現，¹⁰⁶ 就文字脈絡的角度進行觀察，服藥與憂患、悲哀、忿怒等激盪的情緒常構成一種悖反關係，皆是用來鋪陳養生之道的禁忌。換言之，就養生之道而言，與其服藥不如先保養形氣。故彭祖論及延年益壽之方時，強調「不知交接之道，雖服藥無益也」。值得省思的是，在一般的概念中「福壽延長」，福、壽兩者常是併行而至，但彭祖自述早年「數遭憂患」的多舛命運，並無可以授人之術。¹⁰⁷ 此處產生共現的「服藥」與「憂患」，在文本的脈絡中呈顯了人類長生的慾望與生命的現實。

又如李少君故事中「采藥」二字，分別與「少好道，入泰山采藥，修絕谷遁世全身之術」，「武帝殊益懊恨求少君之不勤也」及董仲舒死前的遺言「我得少君神方，我不信事，懷恨黃泉」等產生共現。¹⁰⁸ 第一句勾勒出少君入道契機，後兩句分別寫武帝、董仲舒不得其藥的悵恨。故可見采藥與懊恨、懷恨這三個關鍵詞，同在一個文本段落中產生共現，即使不細讀文本，也可藉由共現圖一窺其中關連。

藉由數位技術所構建出來的遠讀，或存在著部分偏差，但仍提供了明晰的解讀方向與線索。就整體觀之，中古時期因接連不斷的疫病，致使整個社會充斥著因死亡氛圍，即使倖存生者也易興發生命無常的感慨，而帶出的惶恐與悲憂；而志怪小說的涉醫文本常在表現醫術或丹藥的神異，或病者得治後信仰的轉變，而非心情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有因求仙與尋求不死藥未果而產生的惱恨情緒者，暗示著仙途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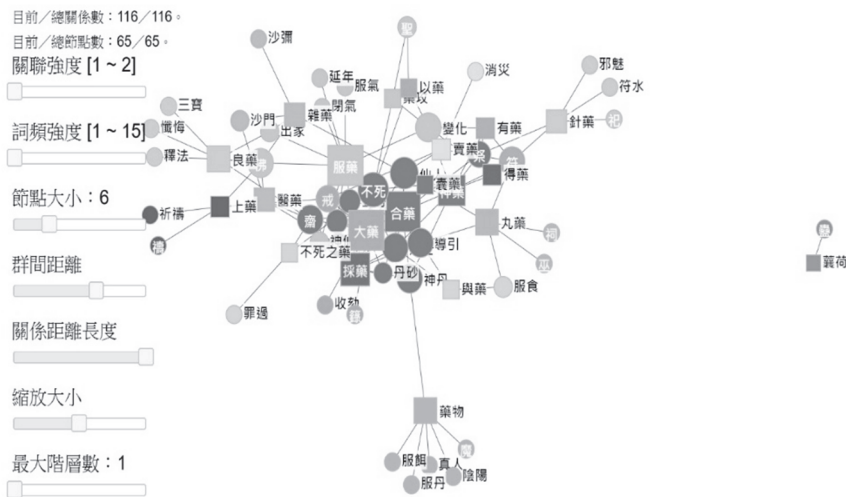
¹⁰⁶ 其言：「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服藥千裏，不如獨臥。……凡遠思強記傷人，憂患悲哀傷人，情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所傷人者甚眾，而獨責於房室，不亦惑哉？」參見〔晉〕葛洪著，胡守為校釋，〈彭祖〉，《神仙傳校釋》，卷1，頁17。

¹⁰⁷ 其言：「……愛精養神，服餌至藥，可以長生……，不知交接之道，雖服藥無益也。……僕遭腹而生，三歲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怙，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令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得度世。所聞素又淺薄，不足宣傳。」〔晉〕葛洪著，胡守為校釋，〈彭祖〉，《神仙傳校釋》，卷1，頁16。

¹⁰⁸ 〔晉〕葛洪著，胡守為校釋，〈李少君〉，《神仙傳校釋》，卷6，頁206-209。

在先前的觀察中，已注意到中古時期的疾病事件與宗教活動間的聯繫，在此進一步觀察醫藥與宗教的共現關係，藉此深入探討中古時期的醫藥與佛道二教間的互動。從圖十五便能看出關鍵詞依照佛道二教分成兩群，推知佛教與道教雖與中古時期的醫藥活動關係密切，然而二者卻展現出不同的樣貌。

從道教與醫藥之間的關係網絡來看，其中以道教求仙佔據的範圍較大，又以服藥及合藥為關鍵，各自連結到金丹、不死、延年、益壽、



圖十四：「醫藥」與「宗教」權威詞共現圖

¹⁰⁹ 詳見劉苑如，〈形見與冥報：六朝志怪中鬼怪敘述的諷喻——一個「導異為常」模式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9期（2006年9月），頁2。

道士、仙人、神丹等詞組，此部分所形成的網絡位於醫藥與宗教共現關係的中心位置，又與道教修行相關的丹藥煉製、導引行氣緊密結合，可以觀察出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求仙思想興盛的痕跡。除此之外，又可以看到在道教醫藥行為中，扣除意指道教金丹的大藥、或與道教丹方關連甚高的神藥、采藥、合藥，可以發現在道教的醫療中，仍然還有使用俗世醫學的針灸與藥物。

關於中古時期道教與醫藥之間的關係，林富士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¹¹⁰ 其已注意到宗教醫學與俗世醫學之別，¹¹¹ 普遍來說，道教在面對疾病時多半採用符水、懺悔、章奏等宗教治療方法，縱使有如葛洪（284-363）、陶弘景（456-536）般接受俗世醫學者，也不將醫藥視為唯一的治療門徑，或賦予醫藥太高的位階。¹¹² 然而在此共現圖中，則可以看到道教在使用符水、懺悔等宗教方式治療疾病時，也會搭配使用俗世醫學的針灸與藥方，可見在經典中雖然有對俗世醫學抱持排斥或保留態度者，然於實務上仍需要藥物、針灸、湯劑等俗世醫學技術予以協助。此外，共現圖中亦能察覺道教與藥物的連結，較之佛教顯得更為緊密，此點除了與道教本身便有煉製丹方、服食丹藥的習慣，更相信仙人所賜神藥能夠帶來的變化，是以在此共現圖中交織成如此龐大的體系與網絡。

再則觀察佛教與醫藥之間的共現關係，可以看到其中以佛和沙門這兩個關鍵詞為核心，連結至醫藥、雜藥、良藥、上藥這幾個詞組，由此發現佛教及其僧眾與醫藥的關係亦相當緊密，此種現象與中古時期的僧人多半具備醫藥知識，更藉由醫療活動以拓展信仰者群體相關。¹¹³ 此時期的志怪小說中也常見到僧人施以醫療救助的情節，

¹¹⁰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頁 163-331。

¹¹¹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頁 207-208。

¹¹²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頁 303-331。

¹¹³ 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僧醫現象的研究，參見以下篇章：高祥，〈魏晉南北朝僧醫考論〉，《佳

如《冥祥記》便記載沙門趙善擅長醫治目疾，時常在荒野處巡行，為需要救助的百姓提供醫療服務。¹¹⁴ 同時，佛教的疾病觀認為，不僅人體失去平衡會導致生病，鬼神侵擾或是前世業報也是生成疾病之因，¹¹⁵ 呈現在共現圖中者，則多是採取祈禱、懺悔、皈依三寶之類的宗教治療手段，如《宣驗記》中安荀身染重病十餘年，雖四處訪醫求治仍未見好轉，直到釋法濟點破此病乃是因業報而起，安荀於皈依三寶、潛心懺悔後，困擾多年的沉痾始得豁然消解。¹¹⁶ 由此可以推知於佛教而言，醫藥與宗教治療同為面對疾病時的處理方式，端看其病因為何，才選擇相應的治療方法。

佛教與醫療行為之間本就有密切的連結，陳明在《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便注意到許多佛教傳世文獻中已包含豐富的醫學內容，也記錄許多佛教寺院中的醫療故事。同時，釋迦牟尼亦常以醫藥為喻，藉此闡明教義，引導信眾尋得解脫之道。¹¹⁷ 佛教對於醫藥的觀點，可見於《法苑珠林》，其言：

夫人有四支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及其失也，承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之喘，竭而為焦故。良醫導之以鍼石，救之以藥濟，……故體有可愈

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第2期，頁131-135。付爽，〈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僧研究概述〉，《亞太傳統醫藥》，2015年第24期，頁6-8。李清、梅曉萍合著，吳鴻洲指導，〈魏晉南北朝僧醫的醫學成就〉，《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頁24-26。

¹¹⁴ 〔梁〕王琰，《冥祥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415。

¹¹⁵ 〔隋〕智顗，《摩訶止觀》：「病起因緣有六：一、四大不順故病。二、飲食不節故病。三、坐禪不調故病。四、鬼神得便。五、魔所為。六、業起故病。」參見〔隋〕智顗，《摩訶止觀》，收入〔日〕高楠順次郎、〔日〕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冊46，卷8，頁106。

¹¹⁶ 〔劉宋〕劉義慶，《宣驗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362。

¹¹⁷ 陳明，《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44。

之疾。¹¹⁸

此處呈現佛教認為疾病發生之因，乃是人體失去平衡所致，面對疾病產生的諸多症狀，無論是生熱發寒、瘤贅癰疽，皆可在良醫以金針砭石、醫方藥物的救治下得以痊癒。由此可知，佛教並不排斥俗世醫學的治療手段，同時佛教典籍中也有許多關於醫藥的記載，¹¹⁹ 甚至於此時期的僧人多半具有醫藥技能，是以能夠提供信仰者醫療服務，如：《冥祥記》便記載居住在常山的兄弟二人，為了病重的家人尋求竺佛調進行醫治。¹²⁰ 此外，在遇到業報等超自然力量形成的病因，也能透過懺悔、祈禱等方式予以協助。相較於依違在俗世醫學與宗教醫學兩端的道教，佛教對於醫藥則保持肯定態度，來華的僧人中更不乏精通醫術者，如安世高便以醫術為吸引徒眾的方式。¹²¹

綜言之，道教與醫藥所展現的網絡，遠較佛教所形成者來得更加複雜，道教求仙與修行往往與醫藥相互連結，以此對抗死亡與尋求長生；同時作為發源於本土的宗教，在醫藥部分的見解，方便藉由信仰者之手形成綿密論述。¹²² 相較於與現世積極對抗的道教，佛教著重

¹¹⁸ 〔唐〕釋道世，〈病苦篇〉，《法苑珠林》，收入〔日〕高楠順次郎、〔日〕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冊 53，卷 95，「醫藥部第四」條，頁 986。

¹¹⁹ 參見釋慧明，〈佛教醫學的定義與典籍〉，《僧伽醫護會刊》第 89 期（2016 年 8 月），頁 7-8；陳明，《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35-256；〔日〕大日方大乘，《佛教醫學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5 年），頁 419-452；〔日〕福永勝美，《佛教醫學事典》（東京：雄山閣，1990 年），頁 79-98。

¹²⁰ 參見〔梁〕王琰，《冥祥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383-384。

¹²¹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頁 72-73。

¹²² 陳寅恪於〈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已注意到道教對醫藥學術的貢獻甚多，同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重要醫學典籍，如葛洪《肘後備急方》、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作者也兼具道士身份。除了醫學論著，葛洪在其談論道教修煉方法的《抱朴子·內篇》亦對醫藥多所著墨，此種現象不僅是道教本身的修行方法重視服食金丹大藥，更與作者出身世家大族，於文字著述一隅已有豐沛涵養，是以能夠透過筆墨細敘自身對於醫藥的觀點。相關論述參見：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4 年第 3 期，頁

於未來解脫，當時的佛教醫學多以印度醫學為主，僧人多為外國來華者，常以神通的形式表現其醫術，故於醫藥論述便不若道教般詳盡。在疫病盛行的時代，除了身體的病痛需要治療外，對於籠罩在死亡陰影下的時疫及其所造成的恐慌，也亟需尋求心靈上的慰藉。前輩學者

目前／總關係數：60／60。

目前／總節點數：34／34。

關聯強度 [1 ~ 4]



詞頻強度 [1 ~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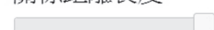
節點大小：8.0



群間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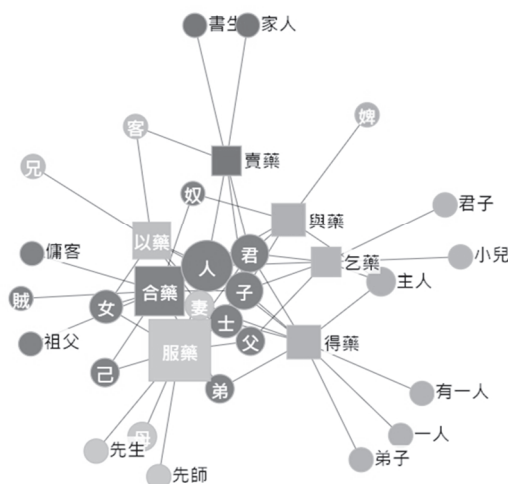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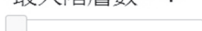
關係距離長度



縮放大小



最大階層數：1



圖十五：「醫藥-藥物施用與流通」與「人際關係」權威詞共現圖

439-466；郭起華，〈從葛洪和陶弘景看道教對古代醫學的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第 1 期，頁 37-42；〔日〕吉元昭治著，楊宇譯，〈中國傳統醫學與道教〉，《宗教學研究》1988 年第 3 期，頁 76-79；〔日〕吉元昭治著，楊宇譯，《道教與長壽不老醫學》（四川：成都出版社，1992 年）；蓋建民，〈道教與中國傳統醫學〉，《中國宗教》2002 年第 3 期，頁 50-52；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頁 52-79；范家偉，〈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醫學〉，收入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主編，《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年），頁 151-193；胡玉珍，《《抱朴子·內篇》道教醫學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5 年）。

已注意到疾病的流行往往成為宗教信仰發展的重要推手，¹²³ 無疑為中古時期的醫療救助與宗教關係密切之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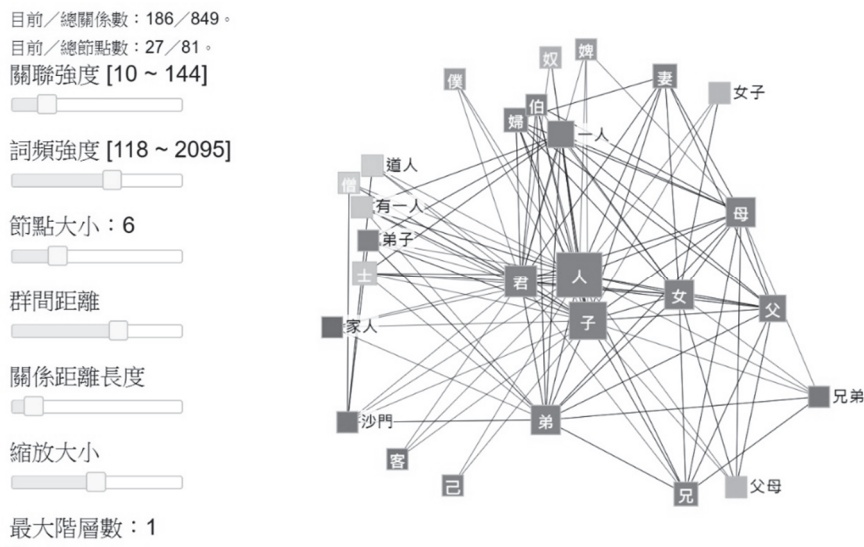
疾病不僅是個人身體健康的問題，也與社會人群密切相關。在先前有關「疾病事實（二字詞）」與「人際關係」（圖五）的共現觀察中，已注意到疾病事件發生之際，除了基於倫理關係而形成的家內照護系統，尚有一群游離於人倫關係之外、同時屬於高強度詞頻的陌生人。換言之，在疾病事件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竟是陌生人與家人，家人固無庸置疑，有趣的是陌生人與疾病何涉？

由於醫藥在疾病與人際關係的互動，以藥物施用與流通的角度最能體現此間連結，故於此處縮小醫藥權威詞範圍，集中觀察藥物施用與流通和人際關係間所展示的現象（見圖十五）。在小說中用以指涉陌生人的人稱代詞，包括「人」、「君」、「子」等，多和「與藥」、「賣藥」、「合藥」、「乞藥」等詞彙相連結，由此看出在疾病事件中，給予藥物者多半是在人際關係中距離較遠的陌生人。無論是主動買賣、祈求藥物者，或是被動獲得他者贈送、給予藥物者，此間最重要的人際關係，仍是以非屬家內親屬的陌生人為主。無論是「人」、「君」、「子」一類的人稱代詞，或是用以標誌某個不知名姓者的「一人」、「有一人」、「縣人」、「書生」等語彙，在彰顯陌生他者於中古小說文本中的重要性。

就常識而言，對於醫藥與人際關係的想像，高強度詞頻者應是落在主要肩負起侍疾重任的家人一隅，然而，無論是圖五「疾病事實（二字詞）」與「人際關係」、或是圖十五「醫藥－藥物施用與流通」與「人際關係」的權威詞共現圖，佔據共現結果前三名者，皆是屬於陌生人的詞彙。此種在醫藥與人際關係中，以陌生人為高強度詞頻的現象，應與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的性質多屬志怪相關，故事中施以醫

¹²³ 林富士，《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頁 52-79。

藥救助的陌生人往往帶有一定的神異性，形成醫藥相關的神異敘述，如：夢中見一人給予藥物，清醒時發現手中握有夢中所見之藥；¹²⁴或是突然出現陌生來客給與藥物，或是告知解除疾病的方法。而此處的陌生人多半是帶有宗教性質的僧與道，藉由種種神異敘述暗示給與藥物的僧道並非凡人；而病者服用此類藥物後，也會立即從疾病狀態痊癒，達到宗教靈驗的徵驗效果。



圖十六：「人際關係」權威詞自我共現圖

沿此脈絡，便從「人際關係」的自我共現圖（圖十六），觀察疾病文本中的人際互動與連結。相較於其他幾類關鍵詞，人際關係在進行共現時所產生的結果是最為複雜者，此點與人際關係所屬的詞彙在疾病文本中大量出現有關，是以折射到共現圖中，便展示出此間的高

¹²⁴ 參見〔劉宋〕劉義慶，《幽明錄》，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267。或是《冥祥記》所記趙習事，參見〔梁〕王琰，《冥祥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439。

度複雜性。在圖十六中，除了給與藥物的陌生人外，另一個呈現出來的關係便是家庭內部的人際網絡，意即父、母、子、女等所建構而成的家內照護關係，此部分可透過人際關係共現圖呈現一二。

由於人際關係中的「人」與「君」往往作為人稱代詞之用，在觀察家內照護關係的父、母、子、女時，也會發現與其產生連結的現象，是以討論家內照護關係時，便會排除此類作為人稱代詞的語彙。在家庭內部成員中，母親（母，83 次）所佔的詞頻較之父親（父，61 次）為高，此種現象則展現傳統人倫敘述，雖以家族傳承觀點強調父子關係的重要性，然而在家庭成員所建構的人際網絡中，則是以母親為核心。¹²⁵ 此處最常呈現的敘事為父母染疾，為人子者侍疾之際，或四處尋訪名醫、或祈求上蒼垂憐予以救治，如：《幽明錄》中朱黃祖之母病篤，幸得仙人幻化的老翁賜藥方能消解病患；¹²⁶《新校搜神記》中楚僚為身染癰腫的後母吮去瘀血，使其得以安寢；¹²⁷《世說新語》中為染瘡疾的父親乞藥尋求救治的稚兒。¹²⁸ 至於「僧」、「道人」、「沙門」這三個屬於宗教類別的詞彙，多與人稱代詞的「人」、「君」、「子」共同出現，除與詞彙本身具有的後綴詞外，更突顯此類詞彙往往代表著家庭外部的陌生人，故於文本敘述中常以人稱代詞進行指涉，而其在文本脈絡中多半以施藥、或是給予醫療救助者的形象出現。此種現象，或許與疾病本身所具有的私密性有關，因此若非家族內部成員，往往很難得知其中概況，唯有施以醫療救助者，方能以陌生人的身份進入此一領域。

相較於透過遠讀「人際關係」自我共現圖所呈現的疾病照護/救助網絡，藉由細讀家人權威詞與「藥物施用與流通」權威詞產生共現關

¹²⁵ 劉苑如，〈問疾：論魏晉南北朝小說疾病敘事中的公、私想像〉。

¹²⁶ 〔劉宋〕劉義慶撰，《幽明錄》，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頁 241。

¹²⁷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 11，頁 81-82。

¹²⁸ 〔劉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91。

係的文本，反而能夠看到沒有呈現在共現圖的線索。相較於為父母侍疾的兒子，女兒在故事中往往以病者的身份出現，並且由其父親訪求醫者為其醫治，如《新校搜神記》記載河內太守劉勳為醫治女兒左膝之痼疾，特地尋訪名醫華佗前來診治；¹²⁹ 或如《神仙傳》中記載董奉受人之託，為其女醫治纏綿多年的疾病。¹³⁰

大體而言，在魏晉南北朝小說中對醫藥抱持著高度信任，縱使非常的神異敘述，醫藥仍然是很重要的治療媒介；同時醫藥也往往與宗教緊密結合，即使對俗世醫學抱持猶疑態度的道教，在實務應用中，仍舊會使用屬於俗世醫學的針灸、藥方等治療方式。而在帶有宗教力量的醫藥介入籠罩死亡陰影的疾病事件時，往往產生立竿見影的轉變，沉痾許久的宿疾往往能夠立即康復，展現人們面對醫藥的深切渴望；即便在醫藥與情緒的共現圖中，留下大量面對疾病時的憂懼與恐慌，凡此彰顯宗教醫療的重要性，既帶來實際的針藥技術發展，在醫身的同時，更醫治、啟發人們的心靈，雙重看護時人的身心靈。

六、結論

數位人文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參與文學研究，不僅僅改變了文學文本的物質性，從實體的書籍型態轉向虛擬的電子型態，延長了保存期限；更重要的是，數位技術長於大數據，透過分析、運算、統計，往往能夠提供鉅量而寬闊的視野，看見整體的趨勢，或者個案研究所不易發現的現象；然而另一方面，傳統的文學研究講究精讀、細讀，挖掘文本表層底下多歧的意義層，兩者乍看是對立的，其中是否有相輔相成的可能，是本文所欲探索的。而隨著數位人文學從典藏到分析

¹²⁹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卷3，頁26。

¹³⁰ 〔晉〕葛洪著，胡守為校釋，〈董奉〉，《神仙傳校釋》，卷10，頁335。

的技術提升，也逐漸反思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其基本學術性格為何，在大數據和遠讀的傳統下，數位文本成為一種資料集型態，在文學研究上究竟碰撞出什麼火花？翁稷安在《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導讀裡提出一種新的可能，即以數位人文的大數據眼光，從文史研究者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傳統出發，去處理「小數據」的問題¹³¹，對於文學研究者而言，這個觀點更是溝通遠讀與細讀兩種研究取徑的關鍵，建構精緻的數位文本資料庫，運用數位平台與工具找出具有研究意義的權威詞，並與各種大型專題資料庫關聯，從而提供更多層次的歷史背景和語境，便能創造出數位文本的閱讀層次。

疾病為人生常有的經驗，疾病文本通常會包括疾病事實和疾病結果的陳述，再依題旨敘述各有偏重，或描述疾病的情緒，或記載疾病狀態，或涉及醫療；從權威詞的分佈來看，則可見疾病並非只是個人的事，而是涉及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常與宗教、神怪和動物有關，特別從數據來看更為清楚。本文以權威詞所建構的問題意識出發，運用詞頻統計、共現等數位技術，對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裡的疾病敘述文本，進行數位人文視野下的遠讀與近讀，藉此呈現出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固有的文本特性，與數位文本的性質或有可通之處。而權威詞共現所拓展的文本空間，也在遠讀與細讀交互補充的過程裡，在「疾病敘述與動物想像」、「疾病敘述與醫藥關懷」這兩個主題上，呈現出其詮釋的空間與限制。

前者從詞頻出發，以詞頻最高的三種動物犬、蛇、虎為例，從動物的物性、與人類的互動關係切入，從而進入疾病的敘述體系當中，顯示出中古疾病與醫療文化中的思想、民俗與宗教內涵。隨著敘事文類的發展，動物脫離上古神話圖騰、政治象徵的平面形象，在魏晉南

¹³¹ 翁稷安，〈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16。

北朝筆記小說的疾病敘述中，走進人類的生活世界，展現生動多元的立體面貌：或為疾痛取喻的想像來源，或為醫療體系的一環，或為疾病事件中角色。從詞頻提取到權威詞檔的共現，數位人文在「詞—物」的對應關係開啟新的思考空間。而帶有分類意識的權威詞群所篩選出的文本，配合逐一的細讀，則聚焦在特定議題所反映思想框架，解析疾病文本所映顯魏晉南北朝的感覺結構，既有物、我共生，家族一體的自覺，卻又隱含對頻繁跨界等非常現象的不安。特別是動物精魅復仇報恩故事，不僅是氣化宇宙的物類知識體系的產物，在傳統崇德報本思想的基礎下，也與中古佛教因果報應思想密切相關。

後者則主要藉由權威詞的共現與互動，觀察醫藥在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裡的疾病敘述，於病患身心所發生的作用與轉變、乃至於此間所開展的人際互動，而非藥理學上的醫療紀錄。在疾疫連綿不絕的中古時期，疾病事件往往與死亡結局緊密相依，隨之而來者，則是面對死亡降臨之際，所浮現的憂慮、恐懼等負面情緒，此皆呈顯人類生命的無常感。由此可以理解，疾病文本透過具備僧道身份的陌生來客，給予帶來奇效的靈藥，反應出籠罩在死亡陰影威脅下的群眾，其心中的盼求。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的醫藥雖然時常伴隨著神異敘述，究其本質，仍是展現出對於醫藥的渴望與信心，同時也可看出此時道、佛二教醫療的積極介入，在傳統家人為主的求醫、侍疾關係外，陌生人間也可廣施博濟，帶來身心靈的多重療癒。在此背景下思考醫藥關鍵詞於疾病文本所映照出來的感覺結構，可以發現宗教色彩與生死關懷為此間最重要的核心，反映出受到疫病威脅的人們，不僅身體的病痛需要尋求治療，惶然不安的心靈也亟需得到撫慰。然而，藉由數位技術開啟的遠讀，仍須藉由文本細讀來補充其意義與連結，才能校正單一數據所倒置的偏差。

由此可見遠讀有助於研究者展開議題，統計數據與視覺化圖表容易披露現象或趨勢，有些符合常識，有些則引人好奇。詮釋現象的過

程中必須再度回到文本細讀，進行修正錯誤、排除歧義、甚至重新反思議題的框架，建立更多的概念、從而也分類出更多的權威詞群組。遠讀與細讀所出現的理解落差，也同時揭示了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的文本特質，以本文所關注的疾病敘述為例，往往涉及了「事件」的定義，筆記小說體制雖短，情節卻未必簡單，事件與事件之間的界線有時候相當模糊，也不是直線的因果關係，這些理解落差所產生的縫隙，便是數位人文學探索的起點。

本文藉由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的疾病敘述為例，試圖去反省當今大數據時代側重「遠讀」之際，如何與文學研究傳統裡的「細讀」對話，彼此的可能性為何、侷限在哪裡，遠讀與細讀並非二元對立的關係，毋寧說是互補的機制，遠讀所揭露的文學現象，即便不合常理、或者在驗證過程裡所發現的錯誤，仍然具有其價值，凸顯出古代中文詞彙的歧義性、模糊性、象徵性，與魏晉南北朝筆記小說敘事結構的情節疏密程度、輯佚的破碎性、以及不同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另一方面，本文也試圖提醒數位人文學者關於「小數據」的處理，大數據的容錯模式並不足以滿足文學研究者的需求，甚至更多時候，數據上的空缺之處、錯誤的演算結果、背離常識的現象，更是文學研究者的興趣所在，其背後往往涉及更幽微的「人性」，這或許也是數位人文學的未來將持續探索的方向。

（責任校對：葉人豪）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西漢〕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局，1990年。
-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影印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本，冊2。
- 〔西漢〕劉安著，劉文典校釋，《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1999年。
- 〔魏〕曹丕，《列異傳》，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
- 〔晉〕干寶著，胡懷琛標點，《新校搜神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
- 〔晉〕干寶撰、〔宋〕陶潛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晉〕王嘉撰，齊治平校注，《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晉〕葛洪著，胡守為校釋，《神仙傳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
- 〔晉〕裴啟，《裴子語林》，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
- 〔劉宋〕東陽無疑，《齊諧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
- 〔劉宋〕劉義慶，《宣驗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

- 〔劉宋〕劉義慶，《幽明錄》，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
- 〔劉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
- 〔梁〕王琰，《冥祥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
- 〔梁〕任昉，《述異記》，收入魯迅，《古小說鉤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隋〕智顗，《摩訶止觀》，收入〔日〕高楠順次郎、〔日〕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收入〔日〕高楠順次郎、〔日〕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二、近人論著

- 王一川，《興辭詩學片語》，濟南：友誼出版社，2005年。
- 付爽，〈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醫僧研究概述〉，《亞太傳統醫藥》，2015年第24期，頁6-8。
- 江紹原，《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側重法術的和宗教的方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李瑞宗，《植物地圖：臺灣低海拔植物生態》，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2000年。
- 李建民，〈崇病與場所：傳統醫學對崇病的一種解釋〉，收入林富士主編，《疾病的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頁23-

76。

李清、梅曉萍合著，吳鴻洲指導，〈魏晉南北朝僧醫的醫學成就〉，《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頁24-26。

李豐楙，〈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一個「常與非常」觀點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頁287-318。

_____，〈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杜正勝，〈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1)〉，《大陸雜誌》第104卷第1期，2002年1月，頁1-14。

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

林富士，〈釋「魅」：以先秦至東漢時期的文獻資料為主的考察〉，收入蒲慕州主編，《鬼魅神魔：中國通俗文化側寫》，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109-134。

_____，〈中國中古時期的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

_____，〈小歷史——歷史的邊陲〉，臺北：三民書局，2018年。

姜廣振，〈論裴啟《語林》的敘事藝術〉，《勝利油田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3期，頁10-13。

胡玉珍，《〈抱朴子·內篇〉道教醫學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5年。

范家偉，〈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醫學〉，收入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主編，《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頁151-193。

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翁稷安，〈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11-20。
- 高祥，〈魏晉南北朝僧醫考論〉，《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第2期，頁131-135。
- 張珣，〈道教「祭解」儀式中的懺悔與「替身」：一個文化心理學的探討〉，收入余安邦主編，《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倫理化的可能探問》，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8年，頁375-417。
- ，〈物與身體感理論：以香為例〉，收入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63-102。
- 郭起華，〈從葛洪和陶弘景看道教對古代醫學的影響〉，《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頁37-42。
- 郭景萍，《情感社會學：理論·歷史·現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臺北：志一出版社，1995年。
- 陳明，《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中古醫療與外來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 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4年第3期，頁439-466。
- 陳雅雯，〈蛇的原型意象研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20期，2013年12月，頁111-146。
- 黃東陽，〈晉裴啟《語林》之佚文考辨——兼論其品鑒人物的思考模式〉，《東吳中文學報》第13期，2007年5月，頁31-49。
- 葉慶炳，《談小說妖》，臺北：洪範書店，1983年。
-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蓋建民，〈道教與中國傳統醫學〉，《中國宗教》2002年第3期，頁50-

52。

劉苑如，〈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點所作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8期，1996年3月，頁365-400。

_____：《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

_____，〈形見與冥報：六朝志怪中鬼怪敘述的諷喻——一個「導異為常」模式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9期，2006年9月，頁1-45。

_____，〈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1期，2007年9月，頁29-74。

_____：〈問疾：論魏晉南北朝小說疾病敘事中的公、私想像〉，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韓國延世大學合辦「情感與「東亞的感性與公共性（II）——日常的結構化和歷史性動力下的新情感」國際學術會議，2014年。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潘朝陽，〈「中心—四方」空間形式及其宇宙論結構〉，《師大地理研究報告》1995年第23期，頁83-108。

潘澤泉，〈理論範式和現代性議題：一個情感社會學的分析框架〉，《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4期，頁52-56。

謝明勳，《六朝小說本事考索》，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

羅玲雲，〈《郭子》與《語林》、《世說新語》〉，《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頁114-118。

釋慧明，〈佛教醫學的定義與典籍〉，《僧伽醫護會刊》第89期，2016年8月，頁6-9。

〔日〕大日方大乘，《佛教醫學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5年。

〔日〕小南一郎，〈『世說新語』の美學——魏晉の才の情をめぐって〉，收入〔日〕小南一郎編，《中国中世史研究統編》，京都：京

- 都大学學術出版会，1995 年，頁 434-472。
- 〔日〕小南一郎著，〔日〕藤奈津紀譯，〈《世說新語》的美學——以魏晉的才與情為中心〉，收入劉苑如編，《桃之宴：京都桃會與漢學新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 年，頁 23-52。
- 〔日〕吉元昭治著，楊宇譯，〈中國傳統醫學與道教〉，《宗教學研究》，1988 年第 3 期，頁 76-79。
- _____，〈《道教與不老長壽醫學》〉，四川：成都出版社，1992 年。
- 〔日〕栗山茂久著，陳信宏譯，《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臺北：究竟出版公司，2001 年。
- 〔日〕福永勝美，《佛教醫學事典》，東京：雄山閣，1990 年。
- 〔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從作品到本文〉，收入朱耀偉編譯，《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臺北：駱駝出版社，1992 年，頁 15-23。
- 〔英〕希林（Chris Shilling）著，謝明珊、廖珮如譯，《轉變中的身體：習慣、危機與創造性》，新北：韋伯文化國際，2013 年。
- 〔英〕胡司德（Roel Sterckx）著，藍旭譯，《古代中國的動物與靈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年。
- 〔英〕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王爾勃、周莉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年。
- 〔英〕維若尼卡·愛恩斯（Veronica Ions）著，杜文燕譯，《神話的歷史》，臺北：究竟出版公司，2005 年。
- 〔美〕喬治·J.E. 格雷西亞（Jorge J. Gracia）著，汪信硯、李志譯，《文本性理論：邏輯與認識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美〕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
- 〔美〕凱博文（Arthur Kleiman）著，陳新綠譯，《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 年。

〔美〕凱博文（Arthur Kleinman）著，張珣譯，〈文化建構病痛經驗與行為：中國文化內的情感與症狀〉，《思與言》第 37 卷第 1 期，1999 年 3 月，頁 255-256。

〔美〕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年。

〔德〕莫宜佳（Monika Motsch）著，韋凌譯，《中國中短篇敘事文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Chen, Jack W., Zoe Borvsky, Yoh Kawano and Ryan Chen. "The Shishuo Xinyu as Data Visualization." *Early Medieval China* 20 (2014): 23-59.

Milburn, Olivia. "Confucius and His Dog: Perspectives on Animal Ownership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and Philosophical Texts," *Chinese Studies* 29(2011): 289-315.

Moretti, Franco.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5.

Moretti, Franco. *Distant Reading*.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3.

Harari, JosuéV.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73-81.

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Williams, Raymond, and Michael Orrom. *Preface to Film*. London: Film Drama, 1954.

三、網路資料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zh>，瀏覽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東亞文學與文化地圖，<http://www.sds.com.tw/web/sinica/eastern-asia/>

main.html?page=p9，瀏覽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瀏覽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數位人文研究平台，<http://dh.ascdc.sinica.edu.tw/member/index.html>，
瀏覽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曾元顯於《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所編輯的「共字分析（co-word analysis）」詞條（2012 年 10 月），收入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辭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878/>，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4 日。

曾元顯於《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所編輯的「詞頻（term frequency）」詞條（2012 年 10 月），收入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辭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878/>，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4 日。

Close and Distant Reading: Illness Texts in the *Biji xiaoshuo* of the Wei-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Yuan-ju Liu*, Pei-hsuan Lo**, Wan-chun Chiu***, Ya-lin Chen****

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is a research method where the preservation pattern of the digital text and the operation analysi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ften allow for a completely new perspective on traditional literary studies. Based on the co-occurrence of authority words, this article combines both “digitally distant” and “textually close” reading to investigate two major topics: “illness narrativ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animals” and “illness narratives and the concern for a cure”. On the basis of word frequency, it examines the images of animals as they became detached from ancient mythological totems and political symbolism, focusing on the illness narratives found in Wei-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魏晉南北朝 short stories where animals are either a metaphor for the imagined source of the illness, are a part of the treatment, or play a role in the illness event. In these narratives, we observe a symbiosis between object and self, as well as a self-consciousness regarding familial unity. They also frequently imply a restlessness about the frequent transgression between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ifferent worlds. Regarding the second topic, we use the co-occurre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authority words to investigate illness narratives related to medicine, the transformative effects illness has on the body and the mind of the sick person,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tient and others during the illness. In the endless epidemics of the medieval period, illness and death were interdependent, which led to a focus on religion and a concern about life and death.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subject matter constructed from authority words and considers illness to be a special life situation. It uses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s, word frequency statistics, analyses of word co-occurrence, etc., to analyze the illness event and its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stories from the Wei-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data and the visualized graphs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this analysis clearly reveal certain phenomena or tendencies, some of which correspond to common sense, others of which provoke curiosity. The gap in meaning thus created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Key words: distant reading, close reading, structures of feeling, illness narratives, co-occurrence analysis, authority words